

梁启超 蔡锷 选编

曾国藩

嘉言钞
治兵语录



岳麓书社



梁启超
蔡锷
选编

曾国藩



岳麓书社



曾文正公嘉言钞目次

一、治身	(1)
二、治学	(71)
三、治家	(149)
四、治世	(179)
五、治政	(203)
六、治军	(244)

曾文正公治兵语录目次

一、将才	(289)
二、用人	(291)
三、尚志	(293)
四、诚实	(295)
五、勇毅	(299)
六、严明	(302)
七、公明	(304)
八、仁爱	(307)
九、勤劳	(309)
十、和辑	(312)
十一、兵机	(314)
十二、战守	(317)



嘉



鈔

曾國藩 著

梁啟超 編



一、治身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至，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

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母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长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至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垢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服，兄也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黻余之言也。

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

五箴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予吾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伐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主敬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扰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实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毫。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以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当，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养身要言

——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处，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
（“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
（“义”所以养肺也）

以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智”所以养肾也）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习气，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今受折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积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愧奋直前，有破釜成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

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金。要做好人，第一要从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堕于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好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端，自然随之。

凡遇牢骚欲发之时，须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些和气，可以消灭病患。

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不能威猛，由于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既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儿侄

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不必锦衣玉衣，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同于“骄”“奢”二字者。尔弟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

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颃颃，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肝郁最易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

各处写信，自不可少。辞气须不亢不卑，平稳惬意。余生平以懒于写信，开罪于人，故愿弟稍变涂辙。

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

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厚耳。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做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含浑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

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尸坐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恢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坐是百无一成。

弟年纪较轻，精力略胜于我，此际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贤谓：“宜用猛火煮，慢火温。”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

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原不外此二者。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人有所恃，则达于面貌，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机。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

之丕基。

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亢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和平”二字相勗，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要！至要！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耳。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嘱！

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视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近来补药不断，且菜蔬亦较奢，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气太弱，不得不尔。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早起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早起，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败。

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服药多也。

天地之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长短，笑人褻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实、早、扫、书、蔬、鱼、猪）、三个信（不信僧道、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

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凡目能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

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宜秘而不宣？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言苦词，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者。

伤寒而反复者，每以服药致误，服补药则更易误。欲求病之有转机，弟须坚持不复服药。今年吴彤云之病，余坚持不服药之说，果得痊愈。虽不可一概而施，然亦可见病情反复之时，惟不服药，而症乃有定象也。

肝气旺，最易伤人，余兄弟皆禀母体，本难强制，然不可不以静坐制之。

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

心。释氏所贵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害吾之躯命而已。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弟病在水不能生木，余亦夙有此疾，非药物所能为力。每日无论如何怕忙，总须略有抽闲之时，或静坐，或渴睡，或散步，火不动，则水得所养矣。

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今日偶过裱画店，见弟所写对联，光彩焕发，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认真调养，不过焦灼，必可渐渐复元。

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哉名，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哉名？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著痕迹。

弟以倔强之性，值久劳抑郁之后，一见亲人，泣涕一场，大闹一场，皆意中所有之事。然为涕为闹，皆可以发摠积郁，皆可以暗调肝疾。

弟近年于阿兄忿激之时，辄以嘉言劝阻，即弟自发忿激之际，亦能有发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后福当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忿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

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为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许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与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弟肝气未痊，全靠自己以心医之。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湿毒因太劳之故，肝疾则沅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犹怀郁郁，天下何一乃为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时哉？

凡后天以脾为主。脾以谷气为本，以有信为用。望两弟常告鼎三，每日多吃饭粥，少吃杂物，无论正餐及点心，守定一个时辰，日日不差。若有小小病症，坚守星冈公之教，不轻服药。

吾阅历极久，但嘱家中老幼，不轻服药，尤不轻服克伐之药，即是善于养生之道。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日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又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弟从前劳苦太久，年近五十，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

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余现在调养之法，饭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咸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孟子》及《礼记》所载养老之法，事亲之道，皆不出此乎？岂古之圣贤皆愚，必如后世之好服参茸燕菜鱼翅海参，而后为智耶？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恒

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辛苦半身，不肯于老年博一取巧之名，巧被人窃笑也。

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巳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

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折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子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即“硬”字诀也，弟当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弟之手痛，尚未及遽成痼疾之年，只要弟心宽和，肝郁稍纾，即可日就康复。古语云：“心病还须自心医。”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关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

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过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难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小则枯槁，过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梁濠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三耻也。

身体虽弱，处多难之世，若能风霜锻炼，苦心劳神，亦自

足坚筋骨而长识见。洗甫叔向最羸弱，近日从军，反得壮健，亦其证也。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遽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余尝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敝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最要之务。

余寸心坦坦荡荡，毫无疑怖。人谁不死，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

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尔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

尔看书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亦不当止于此。今年已廿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功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窶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

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略有人处。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而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次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求，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

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礼》云：“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古之言孝者，专以保身为重。乡间路窄桥孤，嗣后吾家子侄，凡遇过桥，无论轿马，均须下而步行。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余《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胸中不

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即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尽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尔后辈。

张文端公英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

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有刻于安庆）二者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者，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息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病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泰，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年少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

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

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

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著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得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劼刚，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尔天性淡于荣利，再从此二字用功，则终身受用不尽矣。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为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怀惠，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欲将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

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后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勤以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

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短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忤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妒。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垢忌，乖气相倚伏。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不忤》）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

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振。岁燠有时寒，月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分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中嗟忤。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不求》）

日课四条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忤，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能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

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集，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就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寡众，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同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户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敛。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

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管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所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而耐艰苦者，无不见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黽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转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以上《家训》)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

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扫却，勉之。

吴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谓须添一“和”字，则所谓敬者，方不是勉强操持，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

诵《养气章》，以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所谓“德之弃”也，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易·大壮》卦象大众，正与《养气章》通。

“静”字全无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晋卦：“罔孚裕，无咎。”裕，难矣。《中庸》明善诚身一节，其所谓裕学乎！精神便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

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觉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

“咸恒损益”四卦，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鸟啄之杀人，

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巽乎水而上水，颇悟养生家之说。

良峰前辈言：“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一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存心，则缉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则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内外交养，敬义夹持，何患无上达。

至岱云处，看渠日课，岱云近日志日坚而识日卓越，阅之喜不可言。平日好善之心，颇有“若己有之”之诚，而前日读筠仙诗，本日观岱云日课，尤心中好之也。

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静能领取。又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谓“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著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

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此读无妄、咸中、孚三卦，盖扞格者鲜矣。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

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如何，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在何宅听唱昆腔，我心甚静且和，因思古乐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当何如？礼乐不兴，小学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谓阙者“贞”尔，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

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

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日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荏，欲其强，得乎？譬诸草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唐先生言：“国朝诸大儒，推张杨园、陆稼书两先生，最为正大笃实，虽汤文正犹或小逊，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优于德行。”

夜读杨园先生集，中有数条，如破我技求之私，当头棒喝。

读杨园《近古录》，真能使鄙夫宽，薄夫敦。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

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于杜诗，不无一隙之见，而批点之时，自省良有为人之念，虽欲蕴而有味，得乎？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

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而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庄子曰：“美成在久，骤而见信于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骤而得名于时者，其为名必过情。君子无赫赫之称，无骤著之美，犹四时之运，渐成岁功，使人不觉。”则人之相孚，如桃李不合，下自成蹊矣。

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峣峣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阔深矣。

知己之过失，即目为承认之地，改去豪杰吝惜之心，乃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胶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

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时，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须要烂熟于心中。凡读书者，能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蛭，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座右为联语以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

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乐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静动交养，睟面盎背。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饜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纵不能如孟子、元凯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

处逆境之道，惟《西铭》“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等句，最为亲切。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事》蔬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枯亡营扰之私。

本朝博学之家，信多因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阎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戴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王并称，王则为己，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刘、姚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其达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则为己之数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在，而枝叶发生，而自斲茂者也。

邵子所谓观物，庄子所谓观化，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须要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傍夕，与子序登楼，论老年用功，不可有骄气、暮气。

念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三者，《论语》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义，则将庶可为完人矣。

闻子序谈养气章末四节，方孔子之所以异于伯夷、伊尹者，不在高处，而在平处；不在隆处，而在污处。污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圣，以其隆高而异于众人也。宰我之论尧舜以勋业而隆，孔子以并无勋业而污；子贡之论百王以礼乐而隆，孔子以并无礼乐而污；有若之论他圣人以出类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类萃之中不出不穷自处于污。而污下而同于众人，此其所以异于夷、尹也，此其所以为生民所未有也。

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贰者，多猜疑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礼》

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道知仁。

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曰：“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来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为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余近日常写大字，微有长进，而不甚贯气，盖缘结体之际，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松下紧，或上紧下松，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须始终一律，乃成体段。余字取势，本系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恒无所成。推之作古文辞，亦自有体势，须篇篇一律，乃为成家；办事亦自有体势，须事事一律，乃为成章；言语动作，亦自有体势，须日日一律，乃为成德。否则载沉载浮，终无所成矣。

作书者宜临帖摹帖，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易长进。然则作人之道，亦宜专学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贤者，而师法之，庶易长进。

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者阙一不可；学成以三经、三史、三子、三集烂熟为要，而三者亦须提其要而钩其元；艺成以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能是二者，虽不拓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则足以自怡。此虽近于名心，而犹为得其正。

念天道三恶之外，又觉好露而不能浑，亦天之所恶也。

余复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被不祥。”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凡人凉薄之德，约有三端最易独犯。闻有恶德败行，听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灾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人受命于天，如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譬诸金跃冶而以镢镲干将自命。此凉德之二端也。

胸包清浊，口不臧否者，圣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过事激扬者，文士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凉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著尚加戒之。

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围棋论，生而得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如何。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

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钟、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米，则众习于苏、米矣。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而转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真是无马哉？

李申甫黄州归来，稍论时事，余论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意相近，因附识之。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夫子所称“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近日之失，由于心弦太紧，无舒和之意。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日来每思吾身能于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进境。十三字者，谓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也。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余在京师尝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谓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也；三薄者，幸灾乐祸，一薄德也，逆命亿数，二薄德也，臆断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论语》末章所谓知命、知礼、知言也；三乐者，即前所记，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三寡者，寡言养气、寡视培神、寡欲养精。十三字者，时时省察，其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者乎！

圣人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殆孔子所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也”。军中乃争权系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

孔子所谓“下学上达”，达字中必有一种“洞彻无疑”意味，即苏子瞻晚年意思深远，随处自得，亦必有脱离尘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无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识犹未免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此身无论何处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数字，则无人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气谊孤与不孤哉？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尽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竭力为之者，觉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后人之慎择而已矣。

九弟谏余数事，余亦教九弟“静虚涵泳，萧然物外”。

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

不便”矜心”生于不自觉。

忆八年所定“敬”“恕”“诚”“静”“勤”“润”六字，课心课身之法，实为至要至赅。吾近于静字欠工夫耳。

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蹶之时；一向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悦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

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焦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人而不亲，治人而不治，礼人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难体认。若于性分当尽之时，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常无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

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言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

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曰：“切己反求”。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两字，尤觉相远，悚愧无已。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深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阅刘石庵《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文，用逆就之法，故能藏锋。张得天之笔，多师褚、颜二家，用直来横受之法，故不藏锋，而联丝萦带，以发其机趣。二者其理本一贯，特逆蹴与直来横受，形迹判然离合而为一耳。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奇雄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阅王簪林卷

语，亦于此二字三致意焉。

偶思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云：“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黄也。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矩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恒言曰：“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以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来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观何廉舫书扇头小字，倜傥权奇，自成风格，余年已五十，而作书无一定之风格，屡有迁变，殊为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颇有一定之风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证自慰。至于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亦皆无一定之风格。《传》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称。”余一无所成，其不足为君子也明矣。

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

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阙一不可。余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

记性日坏，过目之事，顷刻即去，因立记事册，于应记者，逐日略记一二，从本日为始。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晬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大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愧其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贤否强弱，不胜萦扰，用是忧惭踟躇，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一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烦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

阅理学宗传中朱子、陆子，孙氏所录。朱子之语，多取其

与陆子相近者，盖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

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类，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少壮不学，老报始为此蹇浅之举，抑何陋也！

前曾以四语自敬，曰：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近日又添四语：曰内讼以去恶，曰日新以希天，曰宏奖以育才，曰贞胜以蒙难。与前四语互相表里，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实践一二否？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无使牛羊又从而牧之，如薰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与小岑谭，有不合处，自念一二知心，亦复见疑，则平日之不自修，不见信于人，亦可知矣。可不敬惧乎？

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痾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徬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成舟之势，讵有济哉！

窆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骄，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

冯树堂来——渠近日养得好静气迎人——谈半时，邀余同至岱云处久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此进德。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此刻下手工夫，除谨言、修容、静坐三事，更从何处下手，每日全无切实处，尚晓晓与人说理，说他何益？

是鄙夫之见，于应酬小处计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惩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盗入室矣。

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早起吐血数口，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人大不孝矣。将尽之膏，岂可速之以

风？萌蘖之木，岂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况我之气血素亏者乎？今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

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连日精神不畅，此不可放过。凡天理自然通畅和乐，不通畅处，皆私欲也，当时刻唤醒，不令放倒。”然则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以致之也。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要有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日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赴张雨农饮约，更初方归，席间面谀人，有要誉意思，语多谐虐，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归途便至杜兰溪家商事，又至竺虔处久谈，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邪？耻安在耶？

余体不舒畅，闷甚不适。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畅。”予今闷损至此，盖身被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

日来居敬穷理，并无工夫，故闻人说理，听来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此孰甚。

饭后无所事事，心如悬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静也久矣。

早在朝房言一事，谓无样，予失言欲以口舌胜人，转为人所不服也。

孙高阳、史道邻皆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今已养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凡事豫则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坛兴工、监视、行礼，及制造神牌行礼等事，日内未经虑及，颇觉心中不定，惧致贻误，皆不豫之故也。

是日因早间闻人言，刑部同堂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折，有参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见信于人，遂招此群疑众谤也。

是日“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恐遂成内伤病矣。

心生忿懣，盖无养之故也。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杂念，轻视万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惩，欲不能窒，客气聚于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贵于为道日损故也。

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心绪作恶，因无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适。又以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

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体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

至老洲头登大舟，舟系吴城船厂为余新造者，极坚实，极华丽，因慨然曰：“诵韦公‘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之句，为

之愧悚不已。”

恭读既朱批余之师心自用。余昔己亥年进京，临别请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上又以师心戒我。常刻图书一方，记此二端。

与作梅围棋一局，旋复论人情之厚薄，读书人之多涉于虚浮。作梅所陈，多见道之言。余所发，多有激之词。

比来每以说话微多，逐觉神气疲茶不支，甚矣。身膺重任，大惧陨越，实深惴惴。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忤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

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庶几等一溉于汤世也。

夜洗澡，近制一大盆，盛水极多，洗澡后至为畅适。东坡诗所谓“淤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颇领略得一二。

石芸斋言：“养目之法，早起洗面后，以水泡目。目属肝，以水养之，以凝热之气，祛散寒医，久必有效。”云云，而后《汉书·方术传》云：“爱畜精神，不极视大。”二语亦养目之法。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

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务观言：“养生之道，以目光为验。”又言：“‘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

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

梁荬林中丞《归田琐记》言：“养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谓名言。

余少时每遇困乏，即梦魇。道光十二年间，先大夫数数呼唤不醒，每以为忧，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减者。

癢痒异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夜用水晶界尺熨帖，取其寒而润也。

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

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眠不必甜寝鼾睡而后为佳，但能淡然无欲，旷然无累，闭目存神，虽不成寐，亦尚足以养生。余多年不获美睡，当于此加之意而已。

日来癢痒异常，遍身若有芒刺者然，数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烦，因服“归脾汤”一帖，睡后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数月所未尝有也。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连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岂俗所谓时好、运好，百病除耶？抑扰勤变为逸豫，清明变为昏溺，为衰耗之征耶？

余自三十时，即不能多说话，至数十句，便气不接续，神

尤困倦。今已三十余年，故态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体之强弱，千态万变，未可以一事之偶强，而遽信为寿征，一事之偶弱，而遽信为败征也。

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冀不坠家风。

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围棋太多，读书太久，目光昏涩，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后当戒围棋，即看书亦宜少减，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

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果有效验，可停一二刻不咳。静坐良久，间以偃卧，直至灯时，觉咳痰微减矣。

近来因眼蒙，常有昏瞶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保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书。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日内寸心忧灼，迄无宽舒之时，是以病愈难减，总由少壮不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闷异常耳。

黄静轩劝我静坐凝神，以目光内视丹田，因举四语要诀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灭动心，不灭照心。”又称二语曰：“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有生，谓妄念初生；杀生，谓立予铲除也。又谓此与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谓与朱子《致中和》一节之注亦相通。

阅《福寿金鉴》。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心，并使身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静坐半时许。

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牒，以保将盲之左目。其言恳惻深至，余将遵而行之。

许仙屏送玛瑙，中空积水者，与空青相类。纪泽命匠以金刚钻钻之，取水点于余右目中，闭目少顷，傍夕小睡。

吴竹如为余诊脉，渠谓余病在心肝，虚火上炎，宜静坐以养之，非药所能为力。

闻翰仙言，何境海得静坐之法，于熊槃隐贺幼黼学之，目已瞽而复明，余亦思一试也。

杨芋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时，以两手掌之根际擦极热，加以舌尖之津，闭目擦八十一下，久则有效。日内试为之，而初睡时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益否？

近来每日围棋二局，耗损心力，日中动念之时，夜间初醒之时，皆萦绕于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

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云能为余治目疾，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于吾身五脏云云。因与对坐三刻许。

竹如处坐甚久，灯后归，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漆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

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

日内眼蒙益甚，或谓调息养神。尚可补救，因试为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无当也。（以上《日记》）

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其有所进，幸也；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

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君子之立身，在审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然不忤。故治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懈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

君子之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

也；虽著书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誉，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己者哉？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性既尊，然后吾之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疾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寤寐安恬。

曩昔欲有所钻仰于作者之林，近亦知难而退，不敢复有意矣。惟思谨守大闲，不欲脂韦以规时利，寸心耿耿，独此之执。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谓齐恒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亢盈悔吝之际，不可以不慎也。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贵精不贵多，积小以高大，戒维莠之桀桀，法桃李之不言，当兹艰贞之际，尤不能不进此迂拙之言也。

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

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

鄙人在外，毁誉互见，然究系毁者少而誉者多。清夜自思，尚觉名浮于实十倍百倍也，吾辈互相砥砺，要当以声闻过情为切戒。

“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而不放，恕则不蔽于私。孟子所谓“推”，所谓“达”，所谓“扩充”，指示至为切近。《中庸》之十三章，《论语》之告子贡，告仲弓，皆以“恕”字为开宗要义。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来示以“致知”为大头脑工夫。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道，恕是临时应事之道；致知，则讲求此敬、讲求此恕者也。

军中稍暇，尚亲书籍，不敢尽废故业。又乐近正士，喜闻迂直之言以自警。此二者尚颇兢兢，冀不终为君子所弃。

以至交而兼姻戚，尚不肯面进箴规，欲吐还茹，岂吾固拒人千里耶？愧甚！昌黎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嫫媿。”吾非大官，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

巧言、令色、足恭，三者有志学步，质既鲁钝，学又作辍，数月以来，毫无效验。或劝先难后获，宜再卑抑以俟大效。仆则抱七必不堪，仍将修吾初服，免使陈咸头触扉风耳。

惠箴、不诚不敬之弊，敢不铭佩！惟频年郁结之怀，纸墨难罄，非少佐以诙諧，则满腔秋意，无复生机。张籍昔以此规退之，韩公亦以善戏不虐答之。

人言阴阳俱亏，须施峻补之剂。鄙意阁下春秋方盛，当非纯补所能奏功，恐有风寒忧郁夹杂其中，久病之后，自未可用

克伐寒凉之品，何不概停百药，静养数月，徐察端倪，宜占勿药之喜。

吾辈读书，惟“敬”字“恒”字二端，是彻始彻终工夫。去岁揖别时，曾以‘敬’字相勗，今年致芝生书，亦以有恒为告，盖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至今老而无成，深自悔憾。故凡友人有下问者，辄以己之所悔为言，劝人及时自勉。

教舍沅弟于恶巧恶盈之外，又曰：天道恶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

趋时之效，茫如捕风，亦稍稍倦矣。历年疚心之端，逐一补救，十已得其七八。

来示：“趋时者博无识之喜，损有道之真。”谨当书绅铭佩。吾齿发已老，乃欲俯仰一效桔槔，所谓“未得国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悦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

前臧所称大着眼，小处下手，阁下推广其义，引朱子所谓真正大英雄，须从临深履薄做出，暨浩然之气，敛然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鄙人浅陋，何足语此？惟阅历日久，险艰备尝，觉心目中所规画以为高远者，毕竟手之所持，足之所践，何尝做得三四分。

革薄从忠，鄙意亦夙怀此志，特有天质本来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来之薄，革之已极不易；激之使薄，尤觉旋革旋萌，毫无长进，深以为愧。

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言寡；薄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

阁下尚能黎明即起否？不可间断。一事有恒，皆万事皆可

渐振，毋以为小端而忽之。至嘱！

英年秀挺，自以专心读书，不染官场习气为妥。即世态人情，亦不宜遽令识透，早透则漓其本质而日趋于薄，既薄而返之醇厚，千难万难。

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

国藩才知本拙，今精力惫甚，忽膺此重任，大惧陨越，为天下笑，为乡里羞。请阁下侧听清议，如有显然过失，大拂輿情者，即祈立刻飞缄详示。如其力不能改，别徐图之。若此心，则决不文过而惮改也。

位愈高则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迴越恒俗，颇勿以药石之言相绳。弟日行事，有日记一册，附家报中，阁下如有不谓为然之处，即恳逐条指示，不胜铭感。

凡沉痾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魂梦亦甚不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勗，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阴是惜之风，来云所引先劳之训。盖尝有志焉而未逮。

常守“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戒，不稍涉骄矜之气，则名位日隆矣。

公生平最好用心，尤用心于无可如何之地。庄子有言：“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汉、江西、倏有大变，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辈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愿公于人力所能为者，则略加思虑，于天命之无可奈何者，则冥然不顾。

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著想。圣人言不逆诈不亿不信，吾辈且当不逆，死不亿不起，以为养生之法；不逆败，不亿不振，以为行军之法。（以上《书札》）

（勉强）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人性本善，自为气稟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丧之哀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衰麻苦块，睹物而痛创，自至蹕踊号呼，变节而涕洟随之，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揖让拜跪，人不得已则下之，筐篚豆笾，意不足而文则先之，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

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详。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有大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

（君子小人）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有一自和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见识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以子子为义，以硜硜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义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觐。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之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而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克勤小物）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十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陈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摘累篋；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败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复，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

也。

（才德）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为愚人，幸不以私智诋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诚神）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祷神为臣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簪，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诸人咸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兵气）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蓐，立则仗

锺，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聘乎淄澠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即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多，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为胜，以娱乐为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以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学，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勉强）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成。”《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问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

（忠勤）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大功伟烈，

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天事与人事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骨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侄，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时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才用）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当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牝牛不可以捕鼠，骐驎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钜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才用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贤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史书）《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罌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罌之所度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

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取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阳刚）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即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闥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闥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汉文帝）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乡让三，南乡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终始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丐

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发于中心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帝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

（周亚夫）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锋太隼，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故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皆以人谋而操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与孟子之言相合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权，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有“吾已矣夫”之叹。又似以天命归诸不可知之数，故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语南宫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其隐然以天命为难测，圣贤之言，微旨不同，在学者默会之焉耳。

（功效）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

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睥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子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忤。”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知，皆由此出。”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

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怠，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人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于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方相称，则旁人谓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人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

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劳作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到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牒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余近与寮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证之。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右八者，余庚申六月书于日记册中，用以自警。厥后军事无利，每于家书中录此以诫子弟。芋仙属书居官格言，因录一通。此八者，后四语尤为吃紧，或出或处，不可离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越嬴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余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得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余好读欧阳修公《送徐无党南归序》，乃知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东坡读少陵“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等句，以谓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经纶雷雨，关乎遭际，非人力所能强。至于襟期澹泊，遗外声利，则学者人人可勉也。

书赠弟六则

（清）记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使子弟饮其和，乡党熏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弟于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

（俭）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

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貽累于子孙。

（明）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境，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慎）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顾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年老，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若嬉斗牌等事而毫无忌惮，坏邻党之风气，作子孙之榜样，其所损者大矣！

（恕）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

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刺骨，何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静）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长好动，子弟必纷纷扰扰，朝生一策，暮设一计，虽严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静，先求一身之清静。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乡里之词讼曲直，于我何干？我若强为剖断，始则赔酒饭，后则惹怨恨；官场之得失升沉，于我何涉？我若稍为干预，小则招议物，大则挂弹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敛后辈之躁气，即可保此身之清福。（以上《杂著》）。

二、治 学

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行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漫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吾辈读书，只有二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

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生。”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已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

究其立斋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教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

课程

主敬 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静坐 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读史 廿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

写日记 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日知其所亡 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 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谨言 刻刻留心。

养气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

保身 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 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夜不出门 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

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从觉庵师，若地方相安，则明年仍可以游。若一年一换处，即是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抵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

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读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

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余从前教诸弟，常限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所以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

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叶，摘钞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尔要学诗，先学看一家集，不要

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

然吾所教尔楷法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换笔。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著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向相向矣。二曰结字有法。结字之法无穷，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笔拗而劲，九弟文笔婉而达，将来皆必有成。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看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天道，初不分而二之也。使知大本大原，则心有定向，而不至数摇摇无著。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年过二十，总以看书为主，我境惟彭薄壁先生看书格多，自然无一人讲究者，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彼不看书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务，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可靠，将来求

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每日总宜看二十叶。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叶，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劳，则意浅矣。举此一端，余可类推。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熟则响亮。

话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谁得而信之哉？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

但须日日用功，万不必作叹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至京师，一步不动，则长吁短叹，但曰“京师之远，岂我所能到乎？”则旁观者必笑之矣。吾愿吾弟步步前行，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

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

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之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吾弟诚有志于此，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此外各书能读固佳，不读亦初无所损，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诗，可以不看，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而不看，亦自无妨。但守《小学》《遗规》二书，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篇，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习，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记弟必以兄言为不然，吾阅历甚多，问之朋友皆以为然。儿侄辈写字亦要紧，须令其多临帖。临行草字，亦自有

益，不必禁之。

纪泽儿记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诵，但宜常看生书，讲解数遍，自然有益。

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不必求熟，且将《左传》、《礼记》于今秋点毕，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成败勤惰，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吾与诸弟，惟以身垂范而教子侄，不在海言之谆谆也。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遍，明日看几遍，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生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

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尝间断，惜年老眼朦，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可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名念孙，高邮州人）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

《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邦、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孟坚于典雅环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纪泽看《汉书》，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十二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白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经书已读毕否？须速点速续，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二字，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

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

作字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上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

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己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征。纪泽以后宜握管略高，纵低亦须隔毫根寸余，又须用油纸摹贴，较之临帖胜十倍。

《经义述闻》，博洽精深，非初学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时有不能解者，偶一翻查则可耳。

泽儿问横算磔法，如右手掷石以投人，若向左边平掷，则不得势，若向右边往上掷，则与捺末之磔相似，横末之磔亦犹是也。《化度寺碑》，磔法最明，家中无之。张孟龙碑同州圣教序，磔法亦明，可细阅。

习大字，总以间架紧为主，写成之后，帖于壁上观之，则妍媸自见矣。

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国朝巨儒，多不甚推服。《四库书目》中，于望溪每有贬词，最后《皇清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传先生虽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别有宗尚矣。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

弟平日写信，条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于业经说明之事，再加一二层，反觉无当。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蔓，可喜之至。此后弟每动笔，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尽则止，辞足则止，不必再添也。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

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苏、杜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穡，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出京，至今二十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弟文有不简之处，无不畅之处，不过用功一年二载，便可大进。昔温弟谏余曰：“兄精神并非不足，乃吝惜不用耳。”余今亦以此意谏弟也。

余平日好读东坡《上神宗皇帝书》，亦取其轩爽也。弟可常常取阅，多阅数十遍，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饮食，但得一看适口充肠，正不必求多品也。

《鸣原堂论文钞》、《东坡万言书》，弟阅之如尚有不能解者，宜写信来问，弟每次问几条，余每次批几条。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亦不减对床风雨之乐，弟以不能文为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时，苦学二三年，不可抛荒片刻也。

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达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而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钞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之门，除我所钞者外，难再多选耳。

曾以为学四字，勗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养生与力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强，或是家中振兴之象。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字，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收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待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能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

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我在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称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要便天籁人籁，凑拍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

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

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释谓为勤，尚不数见，释言为我，处处皆然，盖亦十口相传之诂，而不复顾文气之不安。如伐木为文王与友人入山，鸳鸯为明王交于万物，同一穿凿。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朱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爱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

所临隶书，《孔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

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诸老，皆称绝学，然皆不讲占验，但讲推步。占验者，观星象云气，以卜吉凶，《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测七政行度，以定授时，《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是也。秦味经先生之观象授时，简而得要。

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著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

锋时也。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学数月，必与其摹本相肖。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平生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赋》，《剧秦美新》摹《封禅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谏代韩》，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以此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鲁颜公与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称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

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

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至王氏父子以考订之书二十八种，凡家中所无者，尔可开一单来，余当一一购得寄回。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至，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

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童生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钞，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钞，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宏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钞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元》，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

《书经》注疏颇庸陋，不如《诗经》之该博。我朝儒者，

如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盖秦燔书后，汉儒伏生所传，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习，皆仅二十八篇，所谓《今文尚书》者也。厥后孔安国有《古文尚书》多十余篇，遭巫蛊之事，未得立于学官，不传于世。厥后张霸有《尚书》百两篇，亦不传于世。后汉贾逵、马郑作《古文尚书》注解，亦不传于世。至东晋梅賾始献《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虎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证》。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也。《日知录》中略著其原委，王西庄、孙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皇清经解》中有江书不足观）。此亦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凡作文，末数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润。

尔问《五箴》末句“敢告马走”。凡箴以虞箴为最古（《左传·襄公》），其末曰：“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意以兽臣有司郊原之责，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仆耳。扬子云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阶。”扬州曰：“牧臣司扬，敢告执筹。”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执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执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仆夫。”余之“敢告马走”即此类也。走犹仆也（见司马迁《任安书》注，班固宾戏注）。

朱子作《敬箴》曰“告灵台”，则非仆御之类，于古人微有歧误矣。凡箴以官箴为本，如韩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属，皆失本义，余亦相沿失之。

“诗书文义奥衍，注疏勉强牵合”，二语甚有所见。左疏浅近，亦颇不免，国朝王西庄（鸣盛）、孙渊如（星衍）、江艮庭（声）皆注《尚书》，顾亭林（炎武）、惠定宇（栋）、王伯申（引之）皆注《左传》，皆刻在《皇清经解》中，书经则孙注较胜，王、江不甚足取；《左传》，则顾、惠、王三家俱精，大抵《十三经注疏》，以《三礼》为最善，《诗》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驳。

作字换笔之法，凡转折之处，如“丁乚”之类，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ㄣ（末向上挑，所谓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谓波也；右向上行，所谓勒也；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乚（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换而右行，所谓努也）。撇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磔波直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撇向外耳ㄟ（横入停）。凡换笔皆以小圈识之，可以类推，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笔则向左矣。举一反三，尔自悟取可也。

吾觉汉魏文人，有二章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诂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

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皤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皤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裴宏之血，鸟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岛，刷马江州。数军实乎桂林之苑，殄戎旅乎落里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人理矣。

“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種，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穋”（《七月閏宫》），《说文》作種種。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稂异同字也，隶书以稂、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種概用種字矣。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世人论文家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駟）、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马

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驾长卿、子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细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

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

“叙事志传之文，难于行气”。殊不然，昌黎如《曹成王碑》、《韩许公碑》，固属千奇万变，不可方物，即《卢夫人铭》、《女志》寥寥短篇，亦复雄奇倔强。试将此篇熟看，则知二大二小，各极其妙矣。

古人解经，有内传，有外传。内传者，本义也；外传者，旁推曲衍，以尽其余义也。孔子系《易》“小象”则本义为多，“大象”则余义为多。孟子说《诗》，亦本子贡之因贫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绚而悟礼后，证余义处为多。《韩诗外传》，尽余义也，《左传经说》，亦以余义立言者矣。

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

也。有志学书，须窥寻三人门径。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钞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鸟兽草木，皆古圣贤人辨其品汇，命之以名，《书》所称“大禹主名山川”，《礼》所称“黄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后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车、弓、矢、俎、豆、钟、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后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礼乐、兵刑、赏罚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经纶天下，或先有名后有字，或先有事而后有字，故又必知万事之本，而后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后有文词。《尔雅》一书，如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木、释鸟兽虫鱼，物之属也；释器、释宫、释乐，器之属也；释亲，事之属也；释诂、释训、释言，文词之属也。《尔雅》之分类，惟属事者最略；后世之分类，惟属事者最详。事之中又判为二端，曰虚事，曰实事。虚事者，如经之三礼，马之八书，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区别门类是也；实事者，就史鉴中已往之事迹分类纂记，如《事文类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及我朝《渊鉴类函》、《子史精华》等书是也。后世人事日多，史册日繁，摘类书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势所必然。

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与尔曹相和答，仿苏氏父子之例。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

七言。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摩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玄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尔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强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钞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自宋以来，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余早岁归其门径，因人事太繁，又久历戎行，不克卒业，至今用为疾憾。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和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有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书作字，以陶冶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第宜束身圭壁，法王羲之、陶渊明之襟怀潇洒则可，法嵇、阮之方荡名教，则不可耳。

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小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古书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言训诂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云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之《尔雅义注》，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古书惟《广韵》《集韵》，至本朝而顾氏《音学五书》，仍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亦可参观。欲于小学钻研古义，则三宗如顾、江、段、邵、郝、王六家书，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

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亦复尔雅有余，精光不足。扬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渊渊之声。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

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出恒蹊。尔前信读《马汧督誅》，谓其沉郁似《史记》，极是！

极是！余往年亦笃好斯篇，尔若于斯篇及《芜城赋》、《哀江南赋》、《九辩》、《祭张署文》等篇，吟玩不已，则生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且先于怪奇可骇处，思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贯其圆”。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恒怯频窥觐。”从此等起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

余尝怪国朝太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压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

当专心壹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张、左、郭，上而扬、马，而庄、骚，而六经，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陆，而任、沈，而江、鲍、徐、庾，则词愈杂，气愈薄，而训诂之道衰矣。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扬、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甚精当。试观《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诸篇，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又观《祭张籍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

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

纪泽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

问有一专长，是否须兼三者，乃为合作，此则断断不能。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况于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者也。鸿儿言此表范围曲成，横竖相合，足见善于领会。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固属切实工夫，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为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选锐》中所选两排三叠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尔当兼在气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段少，莫拘屋场之格式，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

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

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学柳帖《琅琊碑》效其骨力，则失其结构，有其开张，则无其掣搏。古帖本不易学，然尔学之，尚不过旬日，焉能众美毕备，收速如此神速？余昔学柳、颜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凡作字，总要写得秀。学颜、柳，学其秀而能雅；学赵、董，恐秀而失之弱耳。尔非下等资质，特从前无善讲善诱之师，近来又颇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长进，须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唐诗固宜专读，唐文除韩、柳、李、孙外，几无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读。

唐文李、孙二家，系指李翱、孙樵。八家始于唐荆州之文编，至茅鹿门，而其名大定，至储欣同人而添孔、李两家，御选唐宋文醇，亦从储而增为十家。以全唐皆尚骈俪之文，故韩、柳、李、孙四人之不骈者，为可贵耳。

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是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得之咎也。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扣槃扞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品附和也。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谐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谐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谐，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谈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以上《家训》）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之学。

至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

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过’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修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揜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曰：“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诸生呈缴工课，余教以“诚”“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两事，反复开导。

夏弢甫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夜归，与九弟言读书事。九弟悔从前读得不好，若再不认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

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

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肯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直哉！

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如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连结于隐微者，深也。

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可谓惜分阴者，予则玩泄不振。

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僎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

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何必写此册？

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余比告先生谓素有忿恨，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继续续者，即所谓缉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

岱云欲观余馈贫粮本，予以雕虫琐琐，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一时揜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皆从好名心发出，盖此中根株，深矣。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

朱廉甫前辈偕蕙西来，二君皆直谅多闻者。廉甫前辈之狂过，说欲引余为同志，谓可与适道也。岂知余绝无改过之实，徒有不作之言，竟尔盗得令闻，非穿窬而何？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使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

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此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作子矣。日内耽著诗

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

冯树堂来，因约岱云来，三日畅谈小酌，二君皆有节制，惟予纵论无闲，仍不出昨夜谈议，而往复自意，自谓忠于为人，实以重外而轻内，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训。总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说好。

考试之有得失，犹岁之有丰歉也。有耕而即期大有，是贪天也，然绝不施耕耨之功，不已弃天乎？我则身为惰农，而翻笑穰为多事，慎孰甚焉！

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许余，且曰：“凡阁下所以期许下走之言，信之则足以长自是之私，辞之而又恐负相知之真。吾惟有惧以终始而已。”云云。予闻此数语，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内敛，我何德以当之乎？来日安肆如此，何以为竹如知己？是污竹如也。

处众人中，孤零零若无所许可者，自以为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无足知也，何尤人为？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云阶招与对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

何丹畦请余为是正文字，俨然自任，盖矜心之内伏者，深矣。

日内沾滞于诗，明知诗文以积久勃发为佳，无取乎强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废，是所谓溺心者也。戒之。

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后当切戒。

思人心所以扰扰不定者，只为不知命。陶渊明、白香山、苏子瞻所以受用者，只为知命。吾涉世数十年，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

阅《日知录》，《易经》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汗。

此心褊急清介，殊非载福之道，当力移宽大温润一路。

寸衷微有郁积，总由中无所得，下学而不克上达，故世俗之见，尚不免胶扰于怀中心耳。

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负乘之咎也。

日内与张廉卿屡谈，渠学问又已大进，而余志学二十年，至今毫无进步，耄已及矣！

观人有钞册，钞余文颇多，自以无实而享盛名，忸怩不宁。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耶？

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

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余回忆生愆尤犹丛集，悔不胜悔，而精力疲惫。自问更无年晚之力，乃作一联云：“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神鬼，休预怕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余此生学问文章，一无所成，愧悔无已。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余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闲而心乱，盖生平之一无所养，甚矣！

《易经》有圣人之道四，而朱子专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似未的当。因言古人说经，多断章取义，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义。

阅《经义述闻》，如“弗过遇之，弗过防之”等语，深有所会。余于本朝经学小学诸家，独服臧王怀祖先生父子之精核，盖以其于经文之虚神实训，体味曲尽也。

拟阅校船山《周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而不能轩豁，与《正蒙注》相同。

今日看《书经》，见蔡传训诂，良多不讲，如以敷言为“敷衍之言”之类，宜致汉学家之指摘。

温《召诰》，于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会。

温《书经·无逸》，用吴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会。

思《书经·吕刑》，于句法若有所会。

《吕刑篇》，于后世古文家蹊径最近，惜不能尽通其读。

余所读《吕刑》而若不能尽通其读，兹阅戴氏之说，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于刑之中，天齐于民，俾我一口。”暨“非从惟从”等句，皆犁然有当于人心，欣赏无已。

读顾命康王之诰，喜戴氏治经，与余所见多同，惜其生前未与晤谈。

温《盘庚》上整庚中，因戴存庄两采宋元，及本朝治汉学者之说，每多当人意处，故乐观之。

邵位西言：“《诗序》，系孟子、万章之徒所作，大序与小序，不当分而为二，所以记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犹《史》、《汉》、《法言》之有后序尔！”其言奇而颇确。

阅子序《诗经说》，学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处，特证据太少，恐不足以大鸣于世耳。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仪礼》，至是粗毕。老年能治此经，虽嫌其晚，犹胜于终不措意者。昔张蒿庵三十而读《仪礼》，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为国朝有数大儒。余今年五十七岁，略通此经，稍增秉烛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穷《仪礼》者绝少，能于荆棘荒芜之中，独辟康庄，斯为大难。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有蒿庵之句读，张皋文之图，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则从事甚易矣。

俞樾荫甫所著《群经平议》之十四卷，论《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驳正郑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记图》者。

夜又批船山《礼记》二条。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误者半，盖非校讎家之体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数年在安庆、金陵时，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军营事简，老年差可慰悦之境，而流寇纵横，制敌无术，体衰目昏，学问无成，则又

深为忧灼之境也。

阅桐城张承华容溪所为《学庸臆解》三十四叶毕，其言《大学》文，须用古本，而不烦补传义，须宗朱子，而不取阳阴，与余平日之说相合，余亦多独得之见。

孟子所谓“善言德行者”，当为后世理学诸家之源；“善为辞令者”，当为后世词章诸家之源。孔子自谦不能辞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许，盖在己者实有盛德至行，而后能自道其所得也。《论语》一书，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诵学而、为政、八佾三篇。

朱彬《经传考证》，其训诂考证，亦与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经书大字，多语助辞，则前人所未发也。

阅戴东原《序言》，阅钱竹汀《声类》，此书未刻于本集，其义例亦不分明。

钱辛楣先生《声类》一书，分释诂、释言、释训、释语、释天、释地、名号之异等目，皆因声得义者，足见古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余前有意为是书而未果。钱氏此书，亦未成之书，故未编入《潜研堂丛书》中。

陈荔秋所送之陈兰甫澧著《声律通考》一种，《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一种，略一翻阅，服其精博。

乐律之不可不通，以其与兵事文章相表里。

纪泽作《音学考》，约近五千字，于“考古”及“审音”二者，均有所得，为之一慰。

泽儿呈所著《分韵说文解字》，略一翻阅，其法用《广韵》之次第，《佩文韵》之字数，抄录许氏注，及大徐翻切；

其有申明原注之说，则以夹行注之；其于注外则有陈说，则于翻切之下，夹圈以别异之；其《佩文韵》所有，《说文》所无，则有楷文而无篆文，仍用篇韵各说以注之；其《佩文韵》所无，《说文》所有者，则别为补编，仍依翻切，以分东、冬、种、江各韵。

读《五代史》，于欧公不伪梁一段，不以为然。

阅周保绪所著《晋略》，赵惠甫所寄来者。周名济，荆溪人，著成于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

诸子中，惟老、庄、荀子、孙子，自成一家之言，余皆不免于剽袭。

王怀祖先生《读书杂志》，所校《管子》各条，似不如校他书之精实。

读《淮南子·精神训》，至“大禹竭力以劳万民”句，若有所感。

读《修务训》中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若有所会。《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与《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见极者，百家未尝不合也。

阅《淮南子·椒真训》，言“有道之士，亦须遇时”，为之增感。

扬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实，盖子云文学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

《正谊堂丛书》凡五十六种，张清恪辑刻，吴竹庄所赠

也。因取《正谊堂》中清恪所辑程子二十篇读之，至晡时读毕，凡十卷，取《论语》二十篇之意，编采二程粹言，略分门类，颇为精当。

张清恪公所辑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张公盖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读张文端公《聪训斋语》、文和公《澄怀园语》，此老父子学问，亦以“知命”为第一义。

阅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

《钟涵斋述言》，盖理学之绪余，而参以阴鹭果报者。

《圣武记》又阅一遍毕，中有《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篇未阅，以昔年在京阅过，嫌此八篇叙事冗乱也。

阅曾香墅先生《漫钞》及各种。香墅，名廷枚，宾谷之伯父也。其书仿《困学纪闻》，《容斋随笔》之类，特根底不深耳。

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内有张石洲《蒙古游牧记》四本，又《朔方备乘》凡例数页，信为当世积学之士。

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

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实从熟后生出，所谓“文人妙来无过熟”者此也。

古文之道，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

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

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至，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

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

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是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文势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牋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牋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意推之。

《类纂》所选书牋，有不尽厌于吾心者，未知古人书牋何者最善？

古文中，惟书牋一门，竟鲜佳者。八家中，韩公差胜，然亦非书简正宗，此外则竟无可采。诸葛武侯、王右军两公书

翰，风神高远，最惬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简耳。

阅《骈体文钞》，将其所分类归并于吾所分三门十一类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义也。

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敬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作“和”字。

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字”、“涌”、“直”、“怪”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学。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其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扞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韶，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

《离骚》三百二十四句诵毕。老年读生书成诵，稍补少壮之缺陷，亦一乐也。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千古传诵，余究不知其深处。太史公以邹阳与鲁仲连并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处。

夜温《长杨赋》，于古人行文之气，似有所得。

舆中读《上林赋》千余言，略能成诵，少时所深以为难者，老年乃颇能之，非聪明进于昔时，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故略记之。

余近年最好扬、马、班、张之赋，未能回环朗诵，偶一诵读，如逢故人，易于熟洽，但衰年读书，未必能久记耳。

汉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一贵声调铿锵。

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途、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云卿。韩退之之文，比云卿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

二日内，始悟昌黎诸文，皆学《书经》。

二日内，因读辛、刘词，又大悟韩文之妙，实从子云、相如得来。

二日内，觉于古人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扬、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

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

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

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

韩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汉知之极深，焉能道得出？为文者要须窥得此四字，乃为知本。

韩文志传中，有两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生、王宏两篇为偶，柳子厚、郑群两篇为偶，张署、张彻两篇为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为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称量而配合之耳。

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

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夜阅古赋《识小录》，深有味于柳子厚之《囚山》篇。

姚公谓苏氏学《庄子》外篇之文，实则诙谐处，不逮远甚。

苏子由谓东坡晚年，以文章为鼓吹，真知文章中之乐境。余亦微知之，惜无宽闲岁月，竟其所学耳。

读震川文数首，所谓风尘子读之，一似嚼冰雪者，信为清

洁，而波澜意度，犹嫌不足以发挥奇趣。

阅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书文阅之，其深灏流转之气，乃更胜于古文也。

阅《汤文正集》，惟传、状、碑、铭之类，不惬吾意，余如语录、告谕、书牋之属，皆有诚意挟正气以行，学问本极渊博，讲学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亲王书》，即嘉庆己未获咎，发遣新疆者，当时直声震于天下。今观之，亦无甚触忌讳之处。

阅《梅伯言文集》，叹其钻研之久，工力之深。

至钱警石先生久谈，得见其族兄衍石先生家书数十封，携归一阅，实嘉道间一硕儒也。

阅钱衍石先生与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学问精博，机趣洋溢。

阅陈秋舫、吴伟卿所作应制赋，气势流利，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心赏其能，而自愧弗如也。

《吴竹如文集》，方存之代为编出者，计十二卷，粗阅数十叶，于儒释、朱陆之辨，剖析最精。

阅吴南屏《桦湖文录》数十首，叹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为不可及。

左季高信内寄《祭胡润帅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为杰构。

冯敬亭，名桂芬，寄《校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数十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

窠兰泉近作《辩论》十余首，多阅历之言，而文义未能入

古。

与次青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

蒋琦龄所陈时政十二事，约计万余言，多可见之施行，文笔亦雅健畅达，末条请崇宋学而抑汉学，似与各条不类。

申甫在此畅谈，言渠文笔所以不甚畅者，为在己之禁令太多，难于下笔耳。余劝其破除禁令，一以条畅为主，凡办事者，先贵敷陈朗畅也。

刘霞仙所作《辨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

阅邸抄，中见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调，如此名奏议，而反以获谴，颇不可解。

张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风，日进不已，可畏可爱。

阅张廉卿近所为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为加圈批。

石芸斋所作《房山石经》、《山访碑记》，亦伟观也。

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怀虽淡泊，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管之时，不克殚精极思，作成总不称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首，以摅胸中奇趣？

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匪特事务相扰，时有未闲，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

久不作文，机轴甚生，心思迟钝，尚不能成篇，亦因见客

太多，琐事烦渎，神智昏搅故也。

昔年每作一文，辄数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转无此病，岂反健于壮岁耶？抑用心未能锐入耶？

余生平稍致力于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惫而一无所成，深用自愧。

与儿子一论所作之文，考据与笔力，两无可取。

每一作文，未下笔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笔则无一是处。由于平日用功浮泛，全无实际故耳。

作《孙芝房刍论序》一首，约九百字，至三更始毕。老年作文，愈觉吃力，而机势全不凑泊，总由少作太生之故耳。

作《莫犹人墓表》，文笔平衍，无复昔年傲岸劲折之气，盖老境日增耳。

思作《金陵官绅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痴，向来习态如此，而数十年因循不肯苦学作文，至今已衰老，悔不及矣！

作《苗君墓志铭》毕，细阅竟无一字是处。昔余终年不勤笔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奥，以为将来为之，必有可观。不料今年试作数首，乃无一合于古人笔法，愧赧何极！

作《唐公墓志》，复试无一是处，乃知昔年自诡为知文，而曾不动笔为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

《郭婿铭辞》作毕，全不合古人笔法，深以为愧。

思作《江陵府学宫记》，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属衰惫之象，亦由昔年本无实学，故枯竭至此，深为叹愧。

作《星冈公墓表》，文成视之，无一当意之处，甚矣！余思之钝，学之浅，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也荒陋者。”顷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纪泽所作《拟庄》三首，颇能善谈名理，亦略通训诂奇字之学。

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味趣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能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知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所有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往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

是日思诗既选十八家矣。古文当选百篇，钞置案头，以为揣摩，因自为之记曰：“为政十四门，为学十五书，钞文一百首，钞诗十八家。”

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以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

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始知硕人但颂庄姜之美盛，而无子兆乱，已在言外。太叔于田，但夸叔段之雄武，而耦国兆乱，已在言外，曹、阮、陈、张、李、杜往往有之。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宕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鲍、杜、韩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憾也。

夜阅陶公《述酒》诗，为南宋鄱阳汤文清公汉所注，于陶公度词微旨，尽得解释，欣悦无已。

阅陶诗全部，取其太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

阅《文选杂拟》，古人措词之深秀，实非唐以后人所可及，特气有騫翥骏迈者，亦有不尽然者，或不免为词所累耳。若以颜、谢、鲍、谢之辞，而运之以子云、退之之气，岂不更可贵哉？

批校太白《乐府》，每日仅校二十首或十余首，盖余于乐府向未用功，兹稍一措意，全无入处也。

日来读杜诗，颇有小得。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杜诗，虽细加咀嚼，而究有为人意思。

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能

养气，故无纤薄之响。

温杜诗五古，观其笔陈伸缩吐茹之际，绝似《史记》。忆古人谓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记是东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

阅杜诗五古，古人妙处，只是造句之法，变幻无穷，故终身无一复句，犹之《毛诗》无相袭之调也。昔尝以作古人，宜用杜诗造句之法，近来久未温习及此矣。

温杜诗五古，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苦于不能为之耳。

夜诵杜韩七古，颇多似有会于古人沉郁顿挫之义。

阅《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故思以陶、白、苏、陆之诗，及张文端公之言解之也。

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夜翻《樊川集》证之，亦然，知何大复《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与李眉山谈诗，极佩杜牧之俊伟。

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领其冲淡之趣，洒落之机。

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

放翁七言绝句，实能道得空旷怀出。

将《祁文端公诗集》阅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诗为然，兹多阅数十首，其中多可取者。

朱伯韩诗，所诣在韩、白之间。

至易念园处，观渠所为诗，宗法晚唐，颇有法度。予性好

言诗，蕙西谓余于诗太自主张，不免自是。细思良然。

吴南屏寄毛西垣诗，翻读一过，信为朋辈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称之也。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笔，人人叹之不置。

作七律五首，和何谦舫诗次韵，同和者是李次青、吴子序、甘子大、许仙屏等数人，而王霞轩、郑弥之、何敬海等亦将和之。余见廉舫诗才轩举，所著骈文乐府，皆有可观。悯其闾家殉节，因欲和诗一二章以慰劳之。本无意次韵也，子序、次青诸君皆次其韵，余亦遂勉为之。

阅冯焯诗稿。焯，代州人，字稚华，其七世祖如京，官广东左布政使。六世祖壘，以进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举人官至湖南巡抚。四世祖祁，官编修。曾祖均弼，以举人荫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戍，以举人官浙江知县。焯为潜山县天堂巡检，又署屯溪巡检，刻诗四卷，清稳不俗。昨和余诗八首，今日问之程伯敷，始知其人，因取其诗披阅数十首，兼阅其曾祖及祖刻诗，乃知其世家渊源有自也。

观李眉生诗，爱其俊拔而有情韵，将来必为诗人。纪泽前后作次荏字韵二首，韵稳而脉清，吐属亦尚名贵，将来或亦为诗人，殊以为慰。

赵惠甫近作《书怀》五章，又录旧作词十调见示，皆才人之笔也。

秋海言七律须讲究藻采声调，不可专言上乘证果，反味初开，切中予病。又盛赞予五律。

昔年每作一诗，辄不能睡，后遂阁笔不复为诗。今试一为

之，又不成寐，岂果体弱不耐苦吟耶？抑机轴太生，成之艰辛耶？

作字之法，绵绵如蚕之吐丝，穆穆如玉之成璧。

作字之道，用笔贵勒贵努，而不可过露勒努之迹。精心运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于用勒用努者。

写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谓拨镫法较空灵，余所谓修脚法较平稳。

凡用之笔，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称人意。善书者于每用一笔，先识其病，即因其病势而用之；或笔之病，次日又有小变，又因其变症而用之；或因病成妍，则善于用笔矣。

用狼笔写新宣纸，悟古人顿挫之法、扑笔之法，只是笔不入纸，使劲扑下耳。

京中翰林善写白折者，相传中有一丝牵贯于行间，作大字亦当知此意味。

作书之道，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别味。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作古文古诗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军亦然。

摹书谱不过，乃知艺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处。若人人共见共闻之处，必无通微合妙之诣，若一向在浮名时誉上措意，岂有是处？

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

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将丝毫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故曰“七均斯无声，五和常主淡”也。

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证果。若一向由灵妙处著意，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

作字之道，全以笔阵为主，直以取势，横以出力，当少胜矣。

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

出笔宜颠腹互用，取势宜正斜并见。用笔之颠，则取正势，有破空而下之状；用笔之腹，则取斜势，有歛属踟蹰之象。

夜写零字颇多，略有所会，于昔年“体如鹰……”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内跌宕，外拙直，鹅转颈，屋漏痕。”

古来诗家、文家、书家，皆有所谓笔阵者，厚蓄于阵之初，阵将酣时，又已作变态矣。

作书，思偃笔多用之于横，抽笔多用之于竖，竖法宜努、抽并用，横法宜勒、偃并用。又首贵有俊拔之气，后贵有自然之势。

大约书法不外羲、献父子。余以师羲不可遽几，则先师欧

阳信本；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二路并进，必有合处，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东坡驳之非也。

阅《皇甫碑》，识得欧字意思，知颜柳之硬，褚欧之瘦。学书者，不可不领略也。

因写零字，偶有所得，知欧、虞用笔，与褚相通之故。书家之有欧、虞、褚及李北海，犹诗家之有李、杜、韩、苏，实不祧之祖也。

悟北海上取直势，下取横势，左取直势，右取横势之法，大约直势本于秦篆，横势本于汉隶。直势盛于右军，暨东晋诸帖，横势盛于三魏诸碑。唐初欧公用直势，褚公用横势，李公能兼二势。

孔过庭《书谱》，稍得王大令之法。

余往岁好黄鲁直书，深得晋人真意，而逸趣横生，当更致力。

作书之法，刘石庵善用偃笔，郑板桥善用蹲笔，王梦楼善用缩笔，惟努笔近人无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胜场，吾当于此自极其思耳。

董香光专用渴笔，以极其纵横使转之力，但少雄直之气。余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耳。

作书之法，古人师欧、李、刘、黄，今人师邓、郑、刘、王。

作字之法，亦有所谓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为阳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猷，曰勒，曰努；为阴德之

美者四端：曰馥，曰偃，曰绵，曰远。兼此八者，庶几其为成体之书。在我者以八德自励，又于古今人中择八家以为法，曰欧、虞、李、黄、邓、刘、郑、王。

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著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渊明之诗。著力，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不著力，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犹文家所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

阅刘石庵《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张得天之笔多师褚、颜两家，用直来横受之法，故不藏锋而联丝紫带，以发其机趣。二者其理本一贯，特逆蹴与直来横受，形迹判然，难合而为一耳。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梦刘文清公，与之周旋良久，说话甚多，都不记忆，惟记问其“作字果用纯羊毫乎？抑用纯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处道员之任，曾好写某店水笔。”梦中记其店名甚确，醒后亦忘之矣。

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阅王簪林誉语，亦于此二字三致意焉。

偶思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云：“时贤一石二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黄也。

余在三十以前，作字未能尽心，间架不稳，手腕不稳。四

十以后，略有长进，而手腕时灵时钝，钝时则如古人所谓“姜芽冻痴蝇”者，可自笑也。

日内于作字之道，若有所会，惜精神疲乏，目光眇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学。古人所以贵“及时力学”也。

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阙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几成体之书。

余年始略解书法，而无一定规矩态度，仍归于一无所成。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用墨之松秀，师徐季海所书之朱巨川告身，而辅之以赵子昂《天冠山》诸种，庶几其为成体之书。

用狼毫笔写寸以外字，足以发摅心中迈往之气，为之神怡。

久未作小楷，下笔辄重而不入。是日笔轻稍能入纸，乃悟轮扁甘苦疾徐之说，日内作书，常有长进，盖以每日不间断之故。

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以后当更于意态上著些体验工夫，因为四语，曰：骖属鹰视，拨镫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近来作书，略有长进，但少萧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风韵耳。

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

李、王，取横势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书学张、欧、黄、郑，取直势以尽睨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

日内作字，手甚吃力，拟用“跌”“欹”“注”“卷”四字诀为之，用力轻匀，或转可历久不变。

余近习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姜牙，借古帖使运动稍活耳。

习字一纸，似有所会，因就前所作诗二句，复增二句云：“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端涵，刷如丹漆轻轻抹，换以龙蛇节节衔。”自此专从侧横刷换致力，不复以他妙杂萦吾虑矣。

子愚处观宋高宗书《鹵风》，字画雅洁，图亦工雅绝伦。

黎寿民送手卷，系刘石庵、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顺天闾中所写，各临《兰亭》一本，又书诗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贵，璧之。

李少荃赠以姚惜抱先生所书草字千卷，书苏公登径山诗中有缺脱。姚君学怀素书，不甚沉着，特字以人重耳。

观钱子密家藏书画二种，一为其太高祖母陈太夫人画册，凡十帧，内一帧画一黑犬，一帖画一蝶，未入花丛。时一帧画一虾一蟹二小鱼，一帧花蓝，一帧古柏，一帧梅花仙女，一帧修篁茂林，一帧杨梅、枇杷、二桃，一帧喜雀，一帧萝葡、白菜，皆清华名贵，秀绝人寰。每帧有其夫钱纶光廉江先生题诗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陈群进呈御览，高宗于每帧题七绝一首，并御题一跋于后发还。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诚各

作十诗，恭和元韵，而汝诚详跋于后，以志庆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与侍郎皆歿，而高宗因钱选所画鸟犬，偶忆陈太夫人原册，遣人回浙，取至京师，再呈御览，高宗再题七律一首，长跋一帧，仍归钱氏。信名迹奇遇也！其一种为直庐问寝图，图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陈太夫人所问安之象，为王肇基所绘，亦非俗笔。

子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与一观，谛观之，非真迹也。

钱子密出示其先钱文端之母《夜纺受经图》，高宗及诸名臣题咏甚多，观玩甚久，信家宝也。

休宁瞿令福田送右军帖一本，王梦楼跋断为淳化祖本，且定为唐刻，考核未必确凿。而神采奕奕，如神龙矫变，不可方物，实为希世至宝。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瞿令又送赵侍制仲穆所画飞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绎堂诸先生题跋，亦可宝也。余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审玩片刻，仍尔璧还。去年黎令福畴送刘石庵、翁覃溪二公在闾中所书手卷，余亦璧却。此三件可称祁门三宝。

庄思永带来法帖多种，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虚舟跋，非真迹也。又有大观帖，王梦楼、姚姬传手迹，赏玩片刻。

刘伯山携其所藏西岳华山庙碑，在世所传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长垣本，宋漫堂、成亲王等所递藏，后归刘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谢山及范氏天一阁所递藏，后归阮文达者。一华阴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递藏，后归梁荦林者也。刘氏

本，则其父文淇孟瞻于扬州市肆得之，久不见称于世，亦可宝也。

杨梅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处金石各种，及汇刻邓石如篆隶，又集中兴颂字为联见赠，展玩良久。杨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镇篆道者也。

在李小湖处借得宋拓阁帖，观玩良久。

至李小湖处久谈，观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宝中之丁道护碑、善法寺碑，又观明刻本夏承碑。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书《孟法师碑》，笔意似虞永兴，而结体绝似欧阳率更，与褚公他书不类。一曰丁道护书《启法寺碑》、《隋碑》，而字体有类晚唐矮方而匀整。闻春湖侍郎以千金购之苏州陆恭家。一曰宋拓虞《庙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经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为褚河南书，实魏栖梧书，仿褚法耳！又有晋唐小楷共十一种，其中《乐毅论东方赞》绝佳，乃悟古人用笔之道，如强弩引满，蓄而不发。归途作诗二句云：“侧势远从天下落，横波旋向弩端涵。”

观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拓虞书《庙堂碑》。一、褚书《孟法师碑》。一、丁道护书《启法寺碑》。一、魏栖梧书《善才寺碑》。余于褚书尤爱不忍释。又观《大观帖》三卷，亦唐拓也，展玩良久。

至李小湖处，看其所藏法帖，如欧书《化度寺碑》、褚书《孟法师碑》、虞书《庙堂碑》，皆天下之至宝也。又有魏栖梧书《善才寺碑》、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蔡伯喈书《夏承碑》，亦皆上品。

在李壬叔处见陈香泉法帖，见其草书题画一首，飞舞变化，赏玩无已。惜余老年学书，不复能副吾意之所至耳。

莫子偲得唐人写本《说文》，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记，比较孙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异同，其佳处不可胜举。大喜，以为天下之至宝也！

马征铭有影宋钞本《集韵》，今东南乱后，仅存之本，可贵也！

至莫子偲处，观渠近年所得书，收藏颇富，内有汲古阁开化纸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长，又有白纸初印五体《通考》，其朱字相传系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礼记释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诗》，均善本也。归后，子偲以杜诗本见贶，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为何人也。

至丁雨生家，吃饭之后，看渠所藏书，其富甲于江苏之官绅，最精者，有宋刻《世彩堂韩文》、《东都事略》等书。渠欲以之馈余，余素不夺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内经》、《东雅堂韩文》、《笠泽丛书》三种，携之以归。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凡三十二册，首册序跋、凡例，中卷为京师北二十度至俄罗斯北海上，南十度至越南国。大致以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图，及近人李兆洛图为蓝本，而增小地名颇多，亦巨制也。

与刘开生同观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新图》，东西十九号，每号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见方二里半。中国自有地图以来，以此为最精矣。

苗仙露，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观所藏君子馆砖开元

瓦诗册，属予题诗。

雷藿村以诚送一砚，云系韩襄毅雍之砚，刻一瓶形，襄毅自题曰：“韩瓶砚”。后归王文成公，题砚背数十字。至本朝乾隆中，归阿文成公，王兰泉侍郎昶题砚匣百余字。咸丰中，孔有涵继鏊以赠雷侍郎。今雷又以治我也。（以上《日记》）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迹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治，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

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莱、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断断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

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懣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合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绩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铍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来示甚以抛弃诗书为虑，殊非所宜。将藉此以博取青紫，

则未得之时，邛若神仙，既得之后，晚如败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损！若谓积轴在胸，烈芬在后，则传人之目，谈何容易！见有握槩怀铅，穷老尽气，当时自夸，没亦汶汶。凡若此者，不胜数也。

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汤文正师事孙夏峰，皆以宏名硕学宦成之后，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贤者之意量，度越寻常万万也。

比岁以来，读书之志愈笃而力愈不副，人事日杂，如暗思语，外若石顽，中极了了也！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之属）；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闾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辄妄施批点，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然各有本师，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

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

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刊之典也。

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欧阳公较平和。此外皆刚介倔强，与世龃龉。足下傲骨嶙峋，所以为文之质，恰与古人相合，惟病在贪多，动致冗长。可取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读之，参以侯朝宗、魏叔子，以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参之方望溪、汪纯翁，以药平日浮冗之失。两者并进，所指自当日深，易以有成也。

阁下读书，专取宋元人佳刻。仆意时代不足计，但取校刊尚精，刷印最初者为妙。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于今日，犹汉唐碑帖而今日拓之，剥落补凑，夫何足贵？苟有佳纸初拓，则官板如康熙之《周易》《折中书画谱》，乾隆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私板如国初之汲古阁、近日之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胡克家、张敦仁诸影宋本，亦何尝不可奉为至宝。

早岁有志著述，自驰驱戎马，此念久废，然亦不敢遂置诗书于不问也。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

吾乡读书，间断时多，有恒者少，幸得名师海导，祈于“有恒”二字加意，一暴十寒，圣贤所诫。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划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曰柳

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

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淪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今古名人，虽韩、欧之文章，范、韩之事业，程、朱之道术，断无久不作文之理。张子云：“心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

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仆待人处事，向来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画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现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读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

恒之弊。

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时，易于进功。足下年力方强，直超拔俗，宜趁此时，并日而学，绝尘而奔，虽未必遽跻作者，而看、读、写、作，四者兼营并进，亦自有一番之功效。

退之论文，先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陆士衡、刘舍人辈，皆以骨肉停匀为上，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阁下之文，有骨有肉，似宜于“声色”二字，少加讲求。

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则贬之已甚。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闾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国藩之为是叙，不过于伯宜处，略闻功甫生平之言论风指而纵笔及之，非谓时流诸君子者，果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不特不和之，且私独薄之。南兄识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谓搔着痒处，固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

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生日有寿序，还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谬，而逐其波而拾于沈。

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

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正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有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

清劲为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声色之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于腴润。姚惜抱论诗文，每称当从声音证入，尊兄或可以此二义参证得失。弟夙昔好扬雄、韩愈环玮奇崛之文，而近时所作，率伤平直，不称鄙意，亦云军中日接俗务，不克精心营度耳。

尊书隶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专为隶字言之，东坡欲泛及于真、草诸体，以为未公不凭，非至论也。仆不解作字，昔年治《说文》，曾广购汉魏各碑，讨寻源流，如《礼器碑》，结体方雅，要为隶家正范。《张猛龙碑》，将隶、楷融成一气，尤足津逮来学。唐隶稍肥，有乖大雅，敢为足下陈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专师曹全碑，相沿成风，亦旁门也。

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不特《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等为类书，即“三通”亦类书也，《小学近思录》，衍义、衍义补，亦类书也，故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

读，另行编列别白而定一尊。其分门别类，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

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闲。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误者同日而语。当时批写书眉，本不以为著术之事，后人概以编入笔记之内，殆非姜坞及惜抱之意。

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采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編集者，犹枝龙护砂也。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

而为段，积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国藩以为欲着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近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砭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体，室之有结构，衣之有要领。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

《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余文亦以多读为妙。盖《京都》、《田猎》、《江海》诸赋，虽难于成诵，而造字、形声、训诂之学，即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则并无难成诵者也。（以上《书札》）

（礼）古今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戴，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例义，则或驳而不精，其于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未为失也。

（赦）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人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费祎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孝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贲之，厥后众士傲慢，日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世泽）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穡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文章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回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穡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

稼穡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岗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悔吝）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儒缓）《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贍给，我决如流，此不数数觐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辨者，余或沈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緩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诸

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裘衣大袍，不中节度，敕令掾吏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儒缓，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者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建之功。

（名望）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深；名望愈重，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絮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貶讥于神明也。

（居业）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袞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词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者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汨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英雄诫子弟）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嵩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任。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合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干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勿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公，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尔二人耳。尔一月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昨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归自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犹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皆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

过，捕鱼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命，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近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远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气节）（傲）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屑露素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颢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颢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

仲，此自位高望重，得行其志，已不得不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傲加入者，若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嵇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凯，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义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嵇、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徒，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

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露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讲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土风，殆不诬与。豪侠之

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眊，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垄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同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求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雅阐，反复而不厌者，

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礼而略于用耳！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生死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腌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渚，和者如支河沟洫，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学，

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勗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以上（杂著》）

三、治 家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

闻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

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既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

可不慎也！

信中有云：“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数语，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

若果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褻，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下笔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则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佚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弟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侈之习。

兄妹之子女，犹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别也，故同姓不婚，中表为婚，此俗礼之大失，譬如嫁女而号泣，奠礼而三献，丧事而用乐，此皆俗礼之失。我辈不可不力辨之。

毫无学识，而官至学士，频邀非分之荣，祖父母、父母皆康强，可谓极盛矣。现在京官翰林，中无重庆下者，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惧，不敢求分外之荣，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合家平安，即为至幸。

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

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剥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暂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

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乡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念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衰，余之处境未裕，无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此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嗷鸿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

能偿，然余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我之定计，望诸弟皆体谅之。

乡间若有孝友书香之家，不必问其贫富，亦可结亲。

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诚，而所谓改过修德者，不足以质诸鬼神也。吾与诸弟勉之又勉！务求有为善之实，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此则余家之幸也。

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收拾，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儿侄等听之省之。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诸子侄辈，于勤、敬二字，略有长进否？若尽与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个个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兴者。无论世乱与世治也，诸弟须刻刻留心，为子孙作榜样。

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二字，于族戚人家，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

仁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完。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亲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阁。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闻贺夫人博通经史，深明礼法，纪泽至岳家，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其应行仪节，宜详问谳习，无临时忙乱，为岳母所鄙笑。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

太骤，则难期有恒。

新妇初来，宜教之人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忧，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择婿，望弟详禀父大人，可将此事中辍。纵已通女庚，亦可取还，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觐人家兴衰气象。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虽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难改，不可不慎。

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阔，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

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厉，斯言明征。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睦。

事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谆谆言之。

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第二，贵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蕙二家。又父母坟域，必须改葬，请沅弟作主，澄弟不可过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懒怠奢华，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

居家要勤俭。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过，将来恐难到老。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明，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

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劳力，尚未必果能自立。如真能受委曲，能吃辛苦，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说利害话。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

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

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愿，一则嫌其经过之处，山岭太多，一则既经争讼，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秘惜，不轻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

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閤丽，则传播尤过。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即乱世恐难幸免。

改葬先人之事，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妥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若存一丝求富求贵之念，则必为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续寻得大地者。

家中一切，自沅弟去冬归去，规模大备，惟书、蔬、鱼、猪，及扫屋、种竹等事，系祖父以来相传家法，无论世界之兴衰，此数事不可不尽心。

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至嘱！至嘱！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

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家中之事，望贤弟力为主持，切不可日趋于奢华。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动辄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至戒！至戒！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当此大乱之世，兴造过于壮丽，殊非所宜，恐劫数或有他虑。弟与邑中诸位贤绅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患。此事又系沅弟与弟作主，不可不慎之于始。弟向来于“盈虚消长”之机，颇知留心，此事亦当三思。至嘱！至嘱！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诤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作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总怕子侄习于“骄”“奢”“佚”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子侄须教一“勤”字，一“谦”字。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则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千万勿

忘！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

合家大小老幼，几于无人不药，无药不贵，迨至补药吃出毛病，则又服凉药以攻伐之，阳药吃出毛病，则又服阴药以清润之，展辗差误，不至大病大弱不止。

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忌畏，开口讥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有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

大抵富贵人家气习，礼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外而亲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必有裨益。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留心儆戒。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贾梨头觜栗子山，余亦大不为然，以后宜不妄取与。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强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也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抱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

隆，常恐祖宗留治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

弟晨起极早，饭后始天明，甚为喜慰。吾辈仰法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者，尤为切要！

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为兄弟者，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若明知其错，而一概不说，则非特一人之错，而一家之错也。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弟既如此，并告子侄辈常常如此。子侄若与官相见，总以“谦谨”二字为主。

古人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尚不可烦渎，况丧礼而可烦渎乎？

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蓄之气。余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弟以收蓄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霖，不知与弟道及否？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蓄之

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至危迫之际，则救焚拯溺，不复稍有所吝矣。

生日在即，万不可宴客称庆。此间谍送礼者，余已力辞之，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家门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

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吾弟以为然否？

弟家之渐趋于奢华，即因人客太多之故。此后总须步步收紧，切不可步步放松。总之，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余身体平安，合署内外俱好，惟“俭”字日减一日。余兄弟无论在官在家，彼此常以俭字相勗，则可久矣。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俭”“勤”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回，弟须时时留心。

后辈兄弟，极为和睦，行坐不离，共被而寝，亦是家庭兴

旺之象。

新正人客甚多，不似往年军营光景，余虽力求节俭，总不免失之奢靡。日日以“俭”字诰戒妻子，现略知遵守，亦望吾弟常告内外周知也。

闻家中内外大小，及姊妹亲戚，无一不和睦整齐，皆弟连年筹画之功。愿弟出以广大之胸，再进以俭约之诫，则尽善矣。

后辈体气，远不如吾兄弟之强壮。吾所以屡教家人崇俭习劳，盖艰苦则筋力渐强，骄养则筋力愈弱也。

俭之一字，弟言时时用功，极慰！极慰！然此事殊不易易，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县，昔年仅轿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余名，欲挽回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回三四名乎？随处留心，牢记有减无增四字，便极好耳。

弟军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吾岂忍更有挑剔，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肯微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戆，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愆，遂不容胞弟片言乎？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养。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励，互恭维而已。

弟之声名，即余之声名也。弟之性命，即余之性命也。二者比较，究以保重身体为大。弟自问，身体足以久磨久炼，则余自放心矣。

余中厅悬“八本堂”扁，跋云：“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

得欢心为本。”弟久劳之躯，当极力求少恼怒。

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间妯娌及子侄，和睦异常，有姜被同眠之风，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然亦全赖老弟分家时，布置妥善，乃克臻此。

余蒙先人余荫，忝居高位，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事，不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殊恩异数，萃于一门，祖宗积累阴德，吾辈食此厚报，感激之余，弥增歉悚。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俭”为主。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则尚无五分工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则尚欠工夫。以后各勉其所长，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近日家中内外大小，勤俭二字，做得几分？门第太盛，非此二字，断难久支。

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取金日磾、张世安二传，解示后辈可也。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

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磨矣。

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乃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与弟当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吾兄弟处此时世，居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日免于覬覦，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状，不至一味奢侈。

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

木器但求坚实，不尚雕镂，漆水却须略好，乃可经久；屋宇不尚华丽，却须多种竹柏，多种菜园，即古去田亩，亦自无妨。

家中妇女渐多，外则讲究种蔬，内则讲究晒小菜、腌菜之类，乃是兴家气象。请弟倡之。

星冈公之家法，后世当守者极多，而其不信巫医地仙，吾兄弟尤当竭力守之。

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

银现钱，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字句云：“书蔬鱼猪，考宝早扫。”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蓝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凹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书之，自知谨慎矣。

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远甚，惟此心则与祖父无殊。弟与沅弟，望后辈添丁之念，又与阿兄无殊，或者天从人愿，鉴我三兄弟之诚心，从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且即此一念，足见吾兄弟之同心，无论那房添丁，皆有至乐。和气致祥，自有可卜昌盛之理。

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吾兄弟叨忝爵赏，亦望后嗣子孙，读书敦品，略有成立，乃不负祖宗培植之德。吾自问服官三十余年，无一毫德泽及

人，且愆咎丛积，恐罚及于后裔，老年痛自惩戒，思盖前愆，望两弟于吾之过失，时寄箴言，并望互相切磋，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执恭敬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细思吾兄弟三人之信，断未有不互观者，仍以共写一封为妥。两弟信皆甚密，阿兄目病，而又懒惰，去信较稀，致弟殷殷悬盼，殊抱不安。

仕途巨细，皆关时运，余持此说久矣。然亦只可言于仕宦，若家事亦虽有运，然以尽人事为主，不可信运矣。（以上《家书》）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勗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常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大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尔当体我此意，于叔祖各叔父母前，尽些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无怀彼此歧视之见，则老辈内外必器爱尔，后辈兄弟姊妹必以尔为榜样，日处日亲，愈久愈敬。若使宗族乡

党，皆曰：“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则余欣然矣。

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既冠受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干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善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惰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地仙、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

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

省雇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浚，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浚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吾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知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古今文人学人，莫不有家常琐事之劳其身，莫不有世态冷暖之撓其心。尔现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虽奔走烦劳，犹远胜于寒士困苦之境也。

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情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拚弃不愿，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

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可过啻。

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

吾家累世以来，孝弟俭勤，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

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尔等奉母在寓，总以勤俭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谦慎。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

吾近夜饭不用荤菜，以肉汤沌蔬菜一二种，令极烂如粥，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菜不必贵，适口则足养人），试沌

尔母食之。（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菜，以供晚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崇俭之道也。颜黄门（推之）《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

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矫此弊。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节，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斯干之诗，言帝王居屋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尔等可须留心于莳蔬、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织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

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泽儿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

吾家妇女，须讲求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内则言事父母舅姑，以此为重。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

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晒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

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尔母率二妇诸女，于酒

食、纺织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高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宅，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家中遇祭酒菜，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勤用。内而纺织做小菜，外而蔬菜养鱼，款待人客，夫人均须留心。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

率儿妇辈在家，事事须立个一定章程，作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子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后，尔等视两父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

堂兄弟以德业相助，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书味深者，面目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断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家风。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加。”《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予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以上《家训》）

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富。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与万簏轩偶谈家常，渠家百万之富，而日用极俭，其内眷终年不办荤菜，每日书房先生所吃之荤菜余剩者，撤下则内室吃之。其母过六十后，簏轩苦求，始准添荤菜一样。今乱后而家不甚破，子孙俱好，皆省俭所惜之福也。

心绪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为最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此念愿刻刻懍之。

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以自警惕。兹恐久而遗忘，再书于此，与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庶有悠久气象。

余盖屋三间，上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懔。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己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银钱帐目自行经理，讲求俭约之法。

纪官侄得取县案首，县令考试甚严，当可免于物议，甚以为慰。吾母虑吾兄弟功名太盛，发泄殆尽。观近年添丁渐多，

子弟之向学，或者祖泽尚厚，方兴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在京酒食应酬，虽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鄙俗之见，殊无谓也。

余生平于酬酢之际，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京师势利之藪，处处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于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余以老年吃斋，风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麦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又念纪泽儿在运河一带，风大河浅，家眷各船，胶滞难行。又念施占琦运书箱在海中，恐有不测。种种悬念，不胜焦灼。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损，愧悚无已。

至花园一览，园在署西，现在修工未毕，正值赶办之时，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悲伤，不胜悚惶惭赧。

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

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子孙能独自树立，多读书，无骄矜习气。

闻温弟信，国家事故，忧郁填膺，不能办一事，夜不成寐。

念温弟不得归骨，其赋命太苦，余于手足之间，抱愧多矣。

四弟所写《温甫哀辞》，字秀劲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贤子弟，为之欣然。

沅弟专二人送信，劝我速移东流建德，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余复信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沅季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于二十四日，移营东流，以慰两弟之心。

沅弟来久谈，教以胸襟宜淡远，游心虚静之域，独立万物之表。又每日宜读书少许，以扩识见。弟围安庆，前后皆有强寇，人数甚单，地段甚广，昼夜辛勤，事事躬亲，虽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驰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怜其太劳，故欲其以虚静养心也。

纪泽儿体气清瘦，系念殊深，或称其读书太勤，用心太过，因教以游心虚静，虽有荣观，晏处超然之义。

阅张清恪之子张恣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谨慎等事，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聘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致于无恶不作，皆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

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官，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弟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于此。

接沅弟信，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共得五孙，丁口渐盛，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

与纪泽一谈，嘱其看理学书，俾志气日趋于刚大，心思日入于沉细。

鸿儿禀称澄弟临别，以火狐马褂送我，盖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谓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胜于紫貂玄狐云。余曾两次述此言与澄弟听，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己所著衣以赠我耶？余本有貂马褂、猞猁马褂，而弟归途少此御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接澄、沅两弟信，澄劝送眷回籍，沅拟以晚女许聂家，皆有肫诚顾恤之意。久宦于外，疾病相寻，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亲，能亮之也。（以上《日记》）

但求安先人之体魄，而无毫发富贵之见者存，此人子心根上工夫，当与鬼神相质证者，此宜时时自省。

舍间凡事费用，日趋奢靡，殊以为虑。莳蔬养鱼二事，先人累代皆时时认真经理，敬求足下代我照料，各种书籍，亦求

恒拂尘埃，勿令潮湿。即贱兄弟在外寄回信缄奏稿等件，亦宜聚置一处，免致散失。致人客来往，非房族，即亲友，切不可稍稍怠慢，求恭敬相待，虽舍弟等不在家，亦可款留酒饭也。

四、治 世

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凡有借我银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

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亮其力量所能为。弟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能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但略亮我之诚实耳。

媚嫉倾轧，从古以来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辈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耳。

悠悠之口，本难尽信，然君子爱惜声名，常存冰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

大抵清议所不容者，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说与阿兄不睦。吾人常常欲弟点检者，即所以杜小人之谗口也。

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

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事至今日，惟有“小心安命，埋头任事”二语，兄弟互相勗勉，舍此更无立脚之处。据窦兰泉云：“大丹将成，众魔环伺，必思所以败之。”

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

凡郁怒最易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絀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处间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

建非常之功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于抑郁牢骚。然盖世之事业，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

吾常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若甫在簪用之际，而遽萌前却之见，是贰也。即与他人交际，亦须略省己之不是。

欲求学问文章之日进，又似宜在省会，多求良友，以扩充其识，而激发其志，二者利害参半。若不得良友，而亲损友，

则居省之利少矣。

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胜天，不可以适然者委之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以上《家训》）

镜丈言：“读书有心得，不必轻言著述。注经者，依经求义，不敢支蔓；说经者，置身经外，与经相附丽，不背可也，不必说此句，即解此句也。”

今早友人见示一文稿，读之使人忠义之气，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斩焉而灭。甚矣！人之不可无良友也。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是夜思人之见信于朋友，见信于君父，见信于外人，皆丝毫不可勉强，犹四时之运，渐推渐移，而成岁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长。

室欲常念男儿泪，惩忿当思属纆时。

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

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何其小也！沉吟玩味久之。

思夫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当孟子之时，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所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厉百世矣！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天下事一一责报，则必有大失所望之时。佛氏因果之说，不可尽信，亦有有因而无果者。忆苏子瞻诗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吾更为添数句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人相处，砭我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读书之道，以胡氏之科条论之，则经义当分小学、理学、词章、典礼四门，治事当分吏治、军务、食货、地理四门。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

浮伪之习。

送人银钱，随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轻重，父不能代子谋，兄不能代弟谋，譬如食水，冷暖自知而已。

“与为人善，取人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相善浸灌，即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相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

合，忿狠无礼，二也；齟齬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凡睽起于相疑，相疑由于自矜明察。我之于小珊，其如上九之于六三乎？吴氏谓合睽之道，在乎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药也。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诐”，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不必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竹如说理，实着体验，言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自问亦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瑟、惺、惺、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子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以掩著者耶？

于与人往还，最小处计较，意欲俟人先施，纯是和意萦绕，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饭后静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于此。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银数，抛却一早，可惜！

会客时，有一语极失检，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

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语，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此时绝无忌惮。树堂昨夜云：

“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车中无戒惧意，为下人不得力，屡动气，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往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字颓放耳。可憾！可耻！

坐车中频生气，虽下人不甚能干，实由惩忿绝无工夫，遂至琐细足以累其心。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后，心常忪忪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见，检点细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细，竟夕踌躇，一端之忤，终日沾恋，坐是所以忪忪也。志不立，识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转千思，俱是鄙夫之见。于应酬小处计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惩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盗入室矣。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

观人作应制诗，面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

年在壮岁而颓惰称病，可耻孰甚？今年瞥已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惩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

予对客有怠慢之容。对此良友，不能生严惮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将拒人于千里之外矣。况见宾如此，遑问闲居，火

灭修容之谓何？小人哉！

作梅言：“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于为善”云云。盖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洪琴西来，与之言风俗移人，凡才人皆随风气为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因言：“余老无能有所树立，但不欲开坏风气，导天下以恶习耳。”

见隋观察时，词色大厉，令人难堪，退而悔之。

近来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郁塞殊甚，亦足见器量之不阔，养气之不深也。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为之疏解。清字曰：无贪无兢，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懣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处大乱之时，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人，人人不免。恶其拂逆为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心，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拂逆，以磨厉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鄙可耻，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

光阴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名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秉烛之明，作补牢之计。

近日常见得人多不是，郁郁不平，毋乃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乎？

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能自树立者也。

树堂至情动人，惜不得使舍弟见之兴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见之也。说到家庭，诚有味乎言之。

看子贞所批圈古文及《史记》，信乎其能自立者。扬子云云：“其人为也，多暇日者，其过人也不远矣。”自念如此悠忽，何以自立者？子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

竹如兄与人交，虽人极浓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与之俱深，真是可敬。

何子贞来，谈及渠在国史馆，每天手钞书十页，录《东华录》所不载而事有关系者，约五千字。闻之服其敏而好学。予前冬入史馆，而绝不供职，对之愧杀！

罗椒生来久谈。有志之士，奄然日章，不胜钦服。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献纳，得居言路，可喜也！读廉甫诗数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战不衰，予所不及。

吴子序言：“贤人言保国保天下，老氏言取国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杀机”云云，其义甚精。好学深思，子序不愧。

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据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见故人耶？

刘荫渠自新城来见，六年不面，一面即深相爱重，喜其与三十年在京相见无异，仍是朴讷书生气象，未染军营气习，亦无官场气习也。

孙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阅《论治》六首，通达事理，文亦劲快，杰作也。

汪梅村，名士铎，绩学士也。江宁人，庚子举人，出胡中丞门下。江宁城破，陷贼中，年余后逃出，至绩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请之来鄂署，修《读史兵略》一书。其学精于舆地，曾补画《水经注图》，又精于小学，又曾作《南北史补注》。其师友为胡竹庄培翬、胡云庄承珙、陈硕甫焕、徐星伯松、张石舟穆之属。又言胡墨庄六种、胡竹庄《礼仪》及《焦理堂群经宣室图》等书，最好。

马征麟业师陈雪楼，乙未进士，曾任甘肃知县，著有《周易廓》，及诗集、古文。马读书颇有渊源，曾著《三立明辩》，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诸书，自为条例。又有马寿

华，号小坡，马复震，号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效，志趣亦不卑。

邓守之颇通小学，盖其父完白先生与李申耆先生，皆当代名宿，濡染较深也。

与季高次青晤谈，夜又与季高久谈。季高言：“凡人须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

罗澹村中丞，以乙未进士，历官直隶、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无一钱，旧屋数椽，极为狭陋。闻前后仅寄银三百两到家，夫人终身未著皮袄，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胡中丞熟商江南军事，又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断无中立之理。二人皆许为知言。

周弢甫颇习夷务，所言亦晓畅事理。

贺宏勋带浏阳精于古乐者邱庆箐等六人来。邱系谷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谷士之教，讲求古乐。带来乐器：琴一、瑟一、风箫一、洞箫一、匏一、损一、篪一、笙一，因令奏乐，以鼓节之，音节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圣王修己治人之术，其精者全存乎乐，而后世人独阙者，乃首在乐。余因古人治兵之说，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为耻。思访寻谷士先生之徒党，相与讲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浏阳来皖。儿子纪泽粗晓音律，明年当令来营，究心兹事。

钱子密送其尊甫钱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为香树先

生之曾孙，警石先生之弟，为海宁教官二十七年，在海宁为山长九年，现避乱寓江西新建乡间。生平最喜校书，所校各本题识名曰“曝书杂记”。

严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与司道《论湖北军务》一函，地势之熟，词气之谦，均不可及。

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

李善兰壬叔、杨岷见山来坐，携陈硕甫先生免片一纸，知已由贼中逃出到沪，言将来皖，年八十二岁，段茂堂之弟子，东南之精于经学、小学，岿然仅存矣。

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

柳宾叔，名兴恩，丹徒壬辰举人，七十六岁，精于《谷梁》之学，曾在阮文达家，课读十余年，学术颇有家法也。

单地山于席间盛称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诵如流。老辈好善，不可及也。

冯树堂来久谈。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门一别，至是忽十余年矣。畅叙一切，渠殊无老态，在山中善于调养也。

阅霞仙近来所作诗文，渊懿畅达，较昔年已大进。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论，年方十五而才华如此。黄士寿来示以所作《选将论》，真奇才也！吴翔冈言：“识见高明者，特思践履不平实。”高明则崇效天，平实则卑法地，因进之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次青又作《怀人》诗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韵，绵丽道

劲，才人之笔。

观邓弥之、吴竹庄和诗，竹庄诗牢骚喷薄而出，不忍卒读，盖其中郁抑深矣。

接何廉舫信，写作俱佳，依恋之意，溢于言表，才士不遇，读之慨然。

张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临别依依，余亦笃爱不忍舍去。求为其祖作墓志，近日当应之也。

陈大力来，与之言：“襟怀贵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须看得略平淡些。”

赵蕙甫上条陈一篇，识解阔远，文辞通雅，逸才也。

刘仲忠庶常秉璋，庐江人，李少荃之门生，气象峥嵘，志意沉著，美才也。

严仙舫信来，荐其内侄向师棣，果令器也。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与其子阶自东台来，谈最久。阶字慕徐，其业师为扬州刘孟瞻文淇之子，经学已有师法矣。

阅严秋农《先器识而后文艺论》。严系仙舫通政之子，乐园廉访之孙。年十八，中咸丰丁巳举人，今仅二十三岁，而史事烂熟，识见远大，洵吾乡英俊也。

与许仙屏谈，气节、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嘱其勉于此，以与乡人相切磋。

歙人汪宗沂者，王子怀之婿，呈所作《礼乐一贯录》，虽学识尚浅，而颇有心得。

张文川、贾钟麟，皆绅士之有才者也。

薛晓帆之子薛福成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加赏无已。

戴醇士之长子有恒、季子穗孙来见，尚能世其家学，穗孙新得优贡，器宇轩昂，可喜也。

蒙阴管县令福曜，河南驻防，系倭艮峰相国之胞侄，福新伯观察咸之堂弟，字焕卿，雅饬有循吏风。

石琢堂之曾孙，名师铸，字似梅者，自湖南来，筠仙有书荐之，盛称其才，果俊才也。

雷州举人陈侨森，谈甚久。陈号逸山，许仙屏有书，极赞其文行不群也。

监印委员莫祥芝，患病入城医治，求一见，语言时明时昧，颠连可悯。

黎宗铭，零陵人，向在王璞山营，聪明警敏，字仿左季高，体绝肖，志趣高亢。方期渐进于诚实，遽以疾歿，殊为可惜。

成章鉴在吴城病故，不胜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义爱民，谋勇兼优，方冀其继塔、杨而起，不意其遽逝也。

梦江岷樵，如平生欢。多年未入一梦，兹忽梦之，不胜伤感，但不知温甫弟果尚生存否？温与岷，亦至交也。

接孙芝房信，告病势垂危，托以身后之事，并请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诗十卷、《河防纪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请邵位西作墓志，亦自为手书别之，托余转寄。又接意诚信，告芝房死矣。芝房于去岁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许之。十一月，又寄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即为，而芝房遽

归道山，负此良友，疚憾何极！芝房十三岁入县学、十六岁登乡举，二十六岁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学励品，同辈所钦。近岁家运极蹇，其胞弟鳌洲主事、叔孚孝廉，相继下世，又丧其长子、次子，又丁母忧，又丧其妻，又丧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内，忧能伤人，遂以陨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悯。因忆道光二十八年刘棻云将死之时，亦先为一书寄京以告别，请余为作墓志。凡内伤病，神气清明不乱，使生者愈难为情耳。

子序寄其侄昌筹之文，因阅一过，识见卓越，有子序之风，惜其早死也。

袁漱六有志读书，期至于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偿其一二，良可痛惜。今年六月，郭雨三亲家阵亡，兹又闻漱六之丧，中年哀乐，触绪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胡宫保于八月廿八日亥时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若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罗伯宜来谈甚久，深叹黎寿民之敦厚早逝为可惜。

周弢甫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赵景贤竹生以一在籍绅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绝，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哀悯。拟为一疏，历叙其贤行勋绩，而自请不能赴援之咎。

闻姚秋浦之丧，深以为忧。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至今年余，无日不在艰地困苦之中，兹于疫病，四日不起，可胜悲惋。

邓守之子解，字作卿，于本日寅正在公馆内去世，完白先生之孙也。余派人料理殓殓，未刻昇出。其父曾淳托教训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视，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负重托，殊为歉仄。

至杨朴庵处看病，观其安闲淡定，视死如归，不愧学道君子之自然。病则十分沉重，无可挽回矣。

袁午桥临终有遗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为易翦，勿以长淮为易收。”读之悚动哀感。

李希庵于十月廿八日子刻弃世，苦战多年，家无长物，忠荩廉介，可敬可伤。旋又闻钱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谢，弥深怅惘。

范云吉于十二日戌刻弃世。仁厚正派，而有识见，方意其大有为于时，而止于此，良可痛也。

闻张炼渠没于安庆，为之怛然不释。盖炼渠于徽休闹饷时，百计维持，大受殴辱，而余查办之札，复过于严厉也。

至塔军门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岁，相对涕泣。其三弟咸丰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两弟妇寡居，并出拜见。三弟皆无子，仅塔军门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亲房无可承继之人，实为可惨。其妹其女，并出拜见，泣求提拔其婿等。（以上《日记》）

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

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嚶嚶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顷观先生所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奄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君子之自处常严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胜已者，抑志事之，仆虽蠢顽，有颇识轻重之分闲者。

缓急之求，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谢之，夫人而能也；德于人而责报，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进焉，其受人赐，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报也；其忠于谋人，过辄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监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伐”皆自于此。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谅，盖其难矣。

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而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气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未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

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鸢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砢，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持此身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穷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馁焉，不敢取被说者廓

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

仆寡昧不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说言诤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深渊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干戈之后，自缙绅先生，下逮厮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创痛之意，以惩前而毖后。若仍酣歌恒舞，事过忘忧，漫无悔祸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则此间之乱萌，尚恐未能遽息。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君子直道而行，岂肯以机械峻峨与人相竞御哉？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

平昔有相信之素，则臭腐皆变芬芳；平昔有相疑之端，则见闻无非荆棘。

两心炯炯，各有深信之处，为非毁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别自有在。今欲多言，则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谓“窗棂愈多则愈蔽明”者也。

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苕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今欲矫揉而姁姁向人，是再伪耳！

蟾蜍触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

吾乡数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圣可狂之际，惟当兢兢业业，互相箴规，不特不宜自是，并不宜过于奖许，长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恒以过相砭，以善相砺，千里同心，庶不终为小人之归。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刑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高明”“平实”二义，张杨园先生尝言之矣。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

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耿介人类不耐事，从古已然，更与饱谙世态，当无是虑。

庄生有言：“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行周于鲁，犹推舟于陆也。”古今之异，犹獭狙之异乎周公也。

来示谓“求才之效，不可必得，求才之道，仍须自尽”，自是破的之论。近好求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一药吾党荏弱之风，尚未遽见。

近来饱尝艰险，穷途白眼，所在多有。渠自赋诗有云：“沉舟转侧波涛里，败絮周旋荆棘中。”盖实录也。

惠书称申夫有揽辔澄清之志，只愧尺波不足以纵巨鳞，陋邦不足以发盛业。昔有巨盗发冢，椎掘方毕，棺中人忽欠身起坐曰：“我乃伯夷，何为见访？”盗逡巡去。易一丘，方开凿墓门，见前欠伸者随至曰：“此舍弟叔齐冢也。”今将施巨钩絙饵于蹄涔之水，是犹索珠襦玉押于伯夷之垅，多恐有辜荐贤之盛心。至于推诚扬善，力所能勉，不敢或忽。

手示敬悉。安乐弃予，世态之常，侍去年过此，与今年情形迥异。所示“莫危于渐”诚为笃论，然此时只当用老僧不见不闻法。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党懵懂可以袪不祥也，万事无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语，公安得攘而有之？

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阁下默记。近数日内，取诸人者若干事，与人者若干事，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

昔邵子将天下万事万理，看成四片，近姚惜抱论古文之法，有阳刚阴柔两端。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与友石的云“阳智阴智”殆有同符，第邵子四片之说，颇多安排附会，友石亦不免此弊。能进于自然，则几矣。

既隶其麾下，尚祈忠于所事，无存歧异之见。古人有言：“行衢路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镂。其仪一兮，心如结兮。”窃愿以尸鸠之诗奉勗也。

阁下昔年舌端或有弹射，笔端亦颇刻酷，若祸生有胎，则亦不可不自省而敛抑也。

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以上《日记》）

（功效）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月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心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

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于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其谓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候功候之至，而遽其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之识水，问于没水，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力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以上《杂著》）

五、治 政

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见可而留，知难而退，但不得罪东家，好去好来，即无可耳。

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涂，以扩其识，亦无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耳门亦无人，全仗名声好，乃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山向吉凶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

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只要事事不违天理，则地理之说，可置之不论不议矣。

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礼。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则不为人所与也。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弈一时，诎得谓之贤肖哉？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仓”之制，若能仿而行之，则更为可久。朱子之制，先捐谷数十石，或数百石，贮一公仓内，青黄不接之月，借贷与饥民，冬月取息二分收还（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则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则全蠲之（借一石还一石），但取耗谷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后天下法之，后世效之，今各县所谓“社仓谷”者是也。其实名存实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贷颗粒，且并社仓而无之，仅有常平仓谷，前后任尚算交代，小民亦不得过而问焉。盖事经官吏，则良法美政，后皆归于子虚乌有。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于夏月借与贫户，秋冬月取一分息收还

(每石加一斗)，丰年不增，凶年不减。凡贫户来借者，须于四月初间，告知经管社仓之人，经管人量谷之多少，分布于各借户，令每人书券一纸，冬月还谷销券。如有不还者，同社皆理斥议罚加倍。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争讼理曲者，罚令量捐社谷少许，每年增加，不过十年，可积至数百石，则我境可无饥民矣。盖夏月谷价昂贵，秋冬价渐平落，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无量矣。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大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乡民可与谋始，难与乐成，恐历时稍久，不能人人勇跃输将，亦未必奏效无滞。我家倡义，风示一邑，但期鼓舞风声，而不必总揽全局，庶可进可退，绰绰余裕耳。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挟持，能进不能退也。

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

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餐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云：“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廩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宜敬。弟在外能如此调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匡救之矣。昨信言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去年与弟握别之时，谆谆嘱弟，以效我之长，戒我之短，数月以来，视弟一切施行，果能体此二语，欣慰之

至！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保令名，益崇德业。

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议，且有挂一漏万之虑。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来书有云：“仰鼻息于傀儡羶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将来恐不免于齟齬。去岁握别时，曾以惩余之短相箴，乞无忘也。

善觐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觐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凭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慢喧杂之象，庶为得宜。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在军营，亦获殊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闕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现在上下交誉，军民成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令，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处“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弟于“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敬”字，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

以精力极疲之际，肩艰大难胜之任，深恐竭蹶，贻笑大方。然好事如此，惟有勉力作去，成效祸福，不敢计也。

以私事言之，则余为地方官，若仅带一胞弟在身边，则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嫌疑之际，不可不慎。

弟此次出山，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位则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人不翕然悦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阶亦由之而晋，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如此，名位岂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请求学术。弟与沅弟，既在行间，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学二者，亦宜以力余

自励。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大哥岂不欣然哉？

吾批二李详文云：“须冗员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气，严裁浮费。”弟须嘱辅卿二语，无官气，有条理，守此行之，虽至封疆，不可改也。凡养兵，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余所痛憾。

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勤”一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宵旰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

然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字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近世所称羨督抚之荣，不外宫室衣服安富尊荣等事，而侄则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所居仅营中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服较往岁在京，尤为减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贼党十余万，环绕于祈门之左右前后，几无日不战，无一路不梗，昼无甘食，宵有警梦，军士欠饷至五月六月之久，侄亦不忍独处富饶，故年来不敢多寄银钱回家，并不敢分润宗族乡党者，非矫情也。一则目击军士穷窘异常，不忍彼苦而我独甘，一则上念高曾以来，历代寒素，国藩虽忝食旧德，不欲飨受太过，为一己存惜福之心，为阖族留不尽之泽。此侄之微意，十叔如访得营中家中，有与此论不相符合之处，即请赐书诘责，侄当猛省惩改。

一门之内，迭被殊恩，无功无德，忝窃至此，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说：“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势利之天下，强陵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与妻孥

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盐物利弊，万言难尽，然扼要亦不过数语，太平之世两语曰：“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两语曰：“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何谓出处防偷漏？盐出于海滨场灶，商贩赴场买盐，每斤完盐价二三文，交灶丁收，纳官课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专完灶丁之盐价，不纳院司之官课者，谓之私盐，即偷漏也。何谓售处防侵占？如两湖、江西，均系应销淮盐引之地，主持准政者，即须霸住三省之地，只许民食淮盐，不许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粤私，江民食闽私，亦不许川、粤、闽各贩，侵我淮地，此所谓防侵占也。何谓暗贩抽散厘？军兴以来，细民在下游贩盐，经过贼中金陵、安庆等处，售于上游华阳、吴城、武穴等处，无引无票无照，是为暗贩，无论贼卡官卡，到处完厘，是谓抽散厘也。何谓明贩收总税？去年官帅给票与商人和意诚号，本年乔公给票与商人和骏发号，目下余亦给票与和骏发，皆令其在泰州运盐，在运司纳课，用洋船拖过九袱州，在于上游售卖。售于湖北者，在安庆收税，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于江西者，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在吴城收八文。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

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著

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弟以季之殁于金陵，为悔为憾，则不可也。袁简斋诗云：“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当时以为名句。

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尚不了了。

两宫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浊扬清，赏罚严明，但患无可赏之实，不患无不次之赏，而罚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诛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何，与近日拿问胜帅，又拿问前任苏藩司蔡映斗进京，谕旨皆严切异常。吾辈忝当重任，不恃无意外之罚，而恃无可罚之实。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檄游击之师”而已。

初膺开府重任，心中欲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仅可随时陈奏，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以后从“简当”二字上著力。

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请将钦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

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此是“谦”字之真功夫，所谓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处所不见也。

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折，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

弟于吾劝诫之信，每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此最不可。吾辈居此高位，万目所瞻。凡督抚是己非人、自满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间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

凡大臣密保人员，终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则近于挟长，近于市恩。此后予与湘中函牍，不敢多索协饷，以避挟长、市恩之嫌。弟亦不宜求之过厚，以避尽欢竭忠之嫌。

江西自道光年间，从无销足额引之事，乱后人口减少，即令全食淮引官盐，亦不能销至六万大引之多，况引地被邻私侵占殆尽，焉能一一骤尔夺回？商人奏办三万引之成本四十余万，已极不易，二分之利，又不能动其涎羨之心，加以引地毫无把握，销售难期畅旺，时日稍滞，获利日微。商利既薄，则

所谓包缴厘金盈余者，皆成拖欠展缓之局。

不特余之并未身临前敌者，不敢涉一毫矜张之念，即弟备尝艰苦，亦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劳绩在臣，福祚在国之义，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存一盛名难副、成功难居之意。蕴蓄于方寸者深，则侥幸克成之日，自有一段谦光，见于面而盎于背。

大事实有天意与国运为之主持，非吾辈所能为力、所能自主者。“虚心实力勤苦谨慎”八字，尽其在我者而已。

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金陵幸克，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

事事落人后著，不必退悔，不必怨人，此等处，总须守定“畏天知命”四字。金陵之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以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千嘱！千嘱！无煎迫而深疾也。

弟肝气不能平伏，深为可虑，究之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沅弟虽积劳已久，而才调实未能尽展其长，恐难久甘枯寂。

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吾兄弟受厚恩，享大名，终不能退藏避事，亦惟循前信所言，置祸福毁誉于度外，坦然做去，行法俟命而已。

弟此次赴鄂，虽不必效沈蒋之违道干誉，然亦不可如云仙之讥侮绅士，动辄别棘，大约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

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于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软，向来用人失之于率，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才，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冗，心存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今名。

谢绝陋习，慎重公事，严密以防门内，推诚以待制府，数者皆与余见相合，声誉亦必隆隆日起矣。

提镇副将，官阶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实迹实据，似不必轻言正法。如王清泉，系克复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营，欠饷

尚有数成未发，既打金陵，则欠饷不清，不能全归咎于湖北。余亦与有过焉。因欠饷不清，则军装不能全缴，自是意中之事。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如萧孚泗、朱南桂、唐义训、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无军装，亦难保别人不诬之为哥老会首。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职，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诚切劝谕，令其自悔，而贷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即以吾一家而论，兄与沅弟带兵，皆以杀人为业，以自强为本。弟在家当以生人为心，以柔弱为用，庶相反适以相成也。

古称郭子仪功高望重，招之未尝不来，麾之未尝不去。余之所处，亦不能不如此。

以后调度文书，以少为好。昔胡文忠亦失之多，多则未有不纷乱者。殄、灭等字，不可轻用也。

嗣后奏事，宜请人细阅熟商，不可壹意孤行，是己非人。为嘱！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之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少荃屡言：“疏语不可太坚，徒觉痕迹太重，而未必能即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而他处或有兵事，仍不免诏旨促行，尤为进退两难”等语。皆属切中事理，余是以反复筹思，迄无善策。

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纪泽腊月信，言宜坚辞江省。余亦思之烂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疼心，无日不惧祸也。

余意此时，名望大损，断无遽退之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牙做去，待军务稍转，人言稍息，再谋奉身而退。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息，恒惧罹于大戾，弟来信劝我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一难逆料，然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逢一二。

弟自任鄂抚，不名一钱，整顿吏治，外间知者甚多，并非全无公道。从此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戕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大局日坏，气机不如辛壬、癸甲等年之顺，与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针毡，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亦未始非福。惟余辞江督、筠仙辞淮运司，均不能如愿，恐弟事亦难必允准。至于官相入覲，第一日未蒙召见，圣眷亦殊平平，弟谓其受恩弥重，系阅历太少之故。大抵中外人心，皆以弟之弹章，多系实情，而圣意必留此公，为旗人稍存体面，亦中外人所共亮也。

世局日变，物论日淆，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

之家，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不求获福，但求免祸。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此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任责愈重，指摘甚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世所处，万不能置身世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但求不大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

宦途险峨，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贴登岸者，实不易易。（以上《家书》）

自以菲材，久窃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贪安逸，不图丰豫，以是报国家之厚恩，即以是稍息祖宗之余泽。

凡经制之现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职养廉，记始于乾隆四十七年补足名粮案内，文职养廉，记始于雍正五年耗羨归公案内。尔细查武养数目，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见《明史·职官志·都察院》条内，本与总督、巡抚等官，皆系文职而带兵者，不知何时改为武职。

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逊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

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

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以上《家训》）

闻刘觉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

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所谓，可以为人乎？聊存为“吾朔之饥羊”尔。

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盘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更“无主则己”，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遗体，舍居敬，更无别法，内则专静纯一，以养大体，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是而不自强，吾不信也。呜呼！言出汝口，而汝则背之，是何肺肠？

见罗、瞿、江三县令，因语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厉，颇失“为人上者，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之义。

九弟信，言：“古称君有谏臣，臣有谏君，今兄有谏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若九弟果能随事规谏，又得一二严惮之友，时以正言相劝勉，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

古人言：“昼课妻子，夜课梦寐。”吾于睡中梦中，总乏一种好意味，盖犹未免为乡人也。

夜因武宁杨令与郑奠互讦之案，颇为郁屈不平，继思谦抑之道，凡事须力戒争胜之心，痛自惩艾。

身体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积搁文牍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负疚者而然与。

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与当年周弼甫所论略同。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嗜欲有未淡邪？机心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二日因作折，将公事抛荒未断。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即一日兼治数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钝也。

日内应酬繁多，神昏气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后知高官巨职，足以损人之智，而长人之傲也。

古人云：“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远矣。”余身当大任，而月余以来，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废搁，实深愧惧。惟当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

是日应办奏稿，方不误次日发报之期。一念之情，遂废本日之常课，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于懒也。

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职分所在。虽日读古书，其旷官废弛，与废于酒色游戏者，一也。庄子所谓“臧谷所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

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则以用

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销兵，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

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因念家中多故，纪泽儿病未全愈，心中焦虑之至。而天气阴雨作寒，恐伤麦收，又不知兵事之变态何如，弥觉忧皇，不能自宁。因集古人成语，作一联以自箴曰：“强勉行道，庄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气，不能强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懒散不振之气，不能庄敬以自奋，惜强字相同，不得因发音变读，而易用耳。

沅弟谈久，稍发摅其抑郁不平之气，余稍沮止劝解，仍令毕其说，以畅其怀。沅弟所陈，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与纵谈，至三更。其谏余之短，言：“处兄弟骨肉之间，不能养其生机，而使之畅，遂深为忠告曲尽。”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李鸿章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

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于此等處，痛下針砭。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為人所笑，尤為內疚于心，輾轉慚沮，刻不自安。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忧愧曷已。

夢在场中考试，枯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急之至。惊醒，余以读书科第，官跻极品，而于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已。

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跼蹐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阅温公谨习疏，慨然有感。

隋开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曾不一纪，隋帝嗣位，东征高丽，南幸江都，遂至困穷。唐天宝之八载，帝观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俦，曾不数年，禄山反叛，九庙焚毁，六飞播迁，遂以大变。故国之富不足恃，独恃人主有兢兢业业之一心耳。

李牧在赵，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寝谋；林甫为相，閹閹反；卢杞柄政，李怀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谨置左右之臣，其益于人国者，多矣。

陈汤斩郅支单于之首，匡衡抑其功，仅得封关内侯；郝灵

荃得突厥默啜之首，宋璟抑其功，仅得授郎将。其后汤以非罪而流，灵荃以恸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得伸于其志者，多矣。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于李德裕，至毛发为之洒淅，此与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异？功高震主，或不无自伐之容，“公孙硕肤，赤舄几几”。此周公以为大圣也。

裴耀卿置谕场于河口。河口，即汴水达于黄河之口也。南人舟运江淮之米，自汴以达河口，吴人不习海漕，便令输米于河口之仓而去，则吴人便矣。三门，即砥柱山，在洛阳之东，地最险，不可行舟，耀卿于三门之东西，各置一仓，又凿山开车路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江淮之米既输于河口之仓矣，官为别雇舟，泝河漕至三门之东，视水可通，则径以舟过三门，水险，则由车路挽过三门，输入三门以西之太原仓，然后入渭，以漕关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门，自三门入渭，至长安，凡三次转搬，乃得达也。今天下之漕粮，概用长运，漕至袁浦，黄高于清，则百端营谋，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黄倒污湖之巨患，种种敝坏，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运之法，于袁浦置仓，杨庄各仓，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运两次。为河帅者，治河则不顾淮，治淮则不顾河，治运则不顾河淮，庶几易为力乎？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

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文官加养廉，始于雍正三年之耗羡归公，武官加养廉，始于乾隆四十六年之补缺额名粮。

王霞轩来辞行，将以明日往南丰。余告以用绅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说破，以养其廉耻。霞轩深以为然。

温《循吏传》，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三代下不矫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结，不足以得民心。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

胡中丞言：“州县办上司衙门之差，差费不过百千，而其差总家丁开报，至三四千串之多。县令无所出，则于钱粮不解，积为亏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县，现无丝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县办差者，皆由藩库发实银与州县，令其发给，不使州县赔垫分毫，其名则天家吃亏，其实则州县无可藉口，钱漕扫数清解，为天家添出数十倍之利。”信为知言。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若谓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马”，慄慄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鼎折足，履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方望溪言：“汉

文帝之为君，时时有谦让，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孟子谓：“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

盛时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料理官事，摘由备查，一也；圈点京报，二也；注解摺拒，三也。此三者，夜间之功课，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沅弟信，极论文士之涉于空虚，不可用其言，颇切当。

李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委员之道，以四者为最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一曰勤学问以广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绅士之道，以四者为要，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一曰崇廉让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务实，一曰扩才识以待用。

九弟临别深言：“取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旁烛，则严不中礼耳。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一省风气，依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

周弼甫将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维持风教，勿自菲薄。引

顾亭林《日知录》“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一切以勗之。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谘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皆以君道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每日应办之事，积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国家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

盗，况假国家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是日在途中，见麦稼为旱所伤，高不过二三寸，节气已届收割，而吐穗极少。间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观。嵇康所云“一溉者后亡”，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然百分中不过二三分，余则立见黄槁，纵三日之内大雨，亦无救矣。目击心伤，不忍细看。

为疆吏者，全仗年丰民乐，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则竟日如在桎梏中矣。

阅《吴文节公集》，观其批属员之禀，甚为严明，对之有愧，吾今日之为督抚，真尸位耳！

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以上《日记》）

苏垣为仕宦鳞萃之场，以弟所闻，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佚；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螭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揆斯三者，于吾兄俱未为谐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

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

友所钦属矣。此二年中，悉力讲求捕盗之法，催科之方，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一旦莅任，则措之裕如，人见其耐也如此，又见其有为如彼，虽欲不彪炳，其可得乎？

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大约佩韦多休，佩弦多咎，而阁下尤为要务。语曰：“察见渊中鱼者不祥。”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

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于过。即清厘籍贯一事，亦谓宜崇宽大，未可操之太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

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之人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

国藩近况本窘迫，然际此岁年，即更得江浙试学差，尚忍于廉俸之外，丝毫有所取耶？外顾斯民，内顾身累，虽同一无可奈何，然当此之时，区区身家之困穷，奚足言哉？况困穷尚未甚耶！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者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如足下所条数事，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懣。

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

簪绂之荣，骄人之态，虽在不肖，犹能涤此腥秽。足下乃

以衔版见投，毋乃细人视我，而鄙为不足深语，今亦不复相壁。但求捐此陋伪，而时以德言箴我，幸甚无量！

“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语，国藩读之尤复悚感。盖古之君子，不鄙其君为不可与语尧舜之道，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不自非其身不可为圣贤，而姑悠悠浮沉于庸众之中，岂好为高论哉？非此则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于僇辱之途者也。

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常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不惩，则聚众横行矣。

刻下所急，惟在“练兵”“除暴”二事。练兵，则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则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故急急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佐我不逮，先与以一书，然后剖切示谕之。

自知百无一能，聊贡此不敢畏死之身，以与城中父老，共此患难。

义不敢潜身顾私，以自邻于退缩畏死者之所为。

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渍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

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善贼作子，重兴萌蘖而貽大患乎？

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籍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梟，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顾一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

保甲之法，诚为善政，然刊定科条，散布乡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苟敛于民间，盖或百里而不得一贤焉。世教既衰，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鱼肉孱民而刀匕之，官司布一甲令，徒以供若辈横索暴敛之名目。故团练保甲为今日之要务，而鄙人妄谓皆不可卤莽以行。灭裂以举，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独严缚匪党，动与磔死，差令乡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气而应吾之令

耳。

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城会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祈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轡在公，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

方今民穷财困，吾辈势不能别有噢咻生息之术，计惟力去害民之人，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

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力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劝捐一事，此间亦自有藩篱，过尔浅易，则小民有以朝廷之陋，而视名器为无足轻重。捐输本非民所乐从，即奏请别树一帜，遍札州县委员守催，官样愈多，去题愈远，不若择好友较多，地方较富之县，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于人，精卫填海，杜鹃泣血，或者谅我寸诚，犹有一二起而应者，亦未可知。绅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势。其并无交好，官亦隔阂之县，则不复过而相问，非爱惜道学门面，亦实见官样文章之不足集事。刍狗已陈，斯民之厌弃也久矣。

今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心须拚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家有父兄，病势沉重，众子弟祷神求医，昼夜拯治，不得谓子弟愚陋，遂不使与闻医药之事，亦不得令愚陋之子弟，攘臂专主，乱投药剂。国藩亦子弟中之愚陋者也，攘臂乱投，则吾岂敢？若刲股和羹，吁诚请代之事，则亦尝闻古人之风，跋

者未尝不思千里，眇者未尝不慕离朱也。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有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累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为之之苦衷也。

大局糜烂至此，志士仁人，又岂宜晏然袖视，坐听狂贼之屠戮生灵，而不一省顾耶？

伪军师旅帅之怙恶者，鄙意诛其身，不必及其孥，戮其人，不必焚其屋。大江南北，陷入贼中，数十州县，每县污伪命受伪职者，不下千家，每家皆有亲党，有仇怨。亲党则谓其被胁可怜，仇怨则言其从逆可诛。欲一一宥过刑辜，情真罪当，实非易易。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

讨贼则可，服官则不可，义正辞严，何能更赞一语？惟今日受讨贼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确有凭藉。晋宋以后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军事者，必求领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讨使、统军使、团练使、防御史，处置应援……等使，远不如节度使之得势，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

细绎孔子所称：“从其利者，吾弗如也。”似苟非从其利者，圣人犹将许其舍福而行权，后世不讲于死心之谋利与否，而概援一“权”字以自覆，往往为吏氏所讥，或称阴规起复，或称风某某奏请起复。覆轨相寻，虽以安溪之贤，而彭古愚弹章，不能无登于青简。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国藩昔年锐意讨贼，思虑颇专，而事机未顺，援助过少。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此次再赴军中，销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臧咨，无不批之稟牒，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取利多而民怨，参劾多而官诽，有以此见告者，非不当自省，但不宜以郁畜心中耳。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著力之处。古人云：“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至站脚不牢。”侍平日短处，亦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

迩来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将求一中行之道而从事，又不可以遽几，盖嗟然也。

宦途人情，薄本似纸，不独苏省为然，即他省亦如出一辙；不独节寿各例款为然，即借出之项，赔出之款，一旦本官物故，便尔百呼罔应。

惟志所规，实不克践，推之齐家、治身、读书之道，何一不然？故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但课每日之勤惰，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即以此语卜之。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吾于“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至，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如弟之碌碌乎！

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或者保全江西、两湖，以为规复三吴之本，整躬率属，黜浮崇真。想阁下亦有同情也。

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至要！至要！

道光十九年，在汉口长沙会馆见抽船厘，收者皆卖买微贱之人，坦然交易，无诈无虞。今虽以官抽济饷，仍须带几分卖

买交易气象，不宜多涉官气，牙帖尤卖买场中鄙琐之事，尤不可经衙门人手。减冗员，裁浮费，二语似迂，而关系极巨。批中所谓坐支者少，即去浮费也。

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而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如有文可为牧令、武可为将领者，望无惜时时汲引，冀收“拔茅连茹”之效。若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可不必要多荐，以不收则空劳往返，收之则渐成冗员也。

大概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

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断不可偏重！择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二语。

细观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中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次青擅长过人处极多，惟弟与阁下知之最深，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在高位者，犹或留心察看，分别贞邪，至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将来位望愈高，终不免为其所累。

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鼯鼠五技而窮”也。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凭書辦家人之口說出，凭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勝。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愿師之。

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气。凡正話實話，多說几句，久之人自能諒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尽”。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耻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或稍優，夸訐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規矩之中。以

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局，不乏算细之员，宜用来信之说。

尝熟思袁绍之诛除宦竖，陈元礼之迫胁马嵬，虽一时快心之举，然岂稍有儒生气象者所能为哉？又岂有儒生气象者所应为哉？

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持。（以上《书札》）

（成败无定）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有，或成败，咸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差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

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挫败，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颜者，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

后唐潞王恣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镇郢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劝诫浅语十六条

劝诫州县四条（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门头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速，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良民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几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著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营官四条（上而统领，下而哨弁，以此类推）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扰民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防惰

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卫，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间，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泪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朝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

训有两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

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劝诫委员四条（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忧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巧，逸则易腐，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物，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则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取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攻战、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牋、书函等件。讲究

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见榜样；问于当局则知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愆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分匀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但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辱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专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

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己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必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以上十六条，分之，则每一等人各守四条，合之，则凡诸色人皆可参观。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只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亦在此，愿我同人共勉焉。咸丰十一年九月，曾国藩识。（以上《杂著》）

六、治 军

训戒军中要务

一、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即现在粤匪暴乱，为神人所共怒，而其行军，亦系四更吃饭，五更起行。营中起太晏，吃饭太晏，是一大坏事，营规振刷不起，即是此咎。

一、扎营一事，男每苦口教各营官，又下札教之，言：“筑墙须八尺高，三尺厚，壕沟须八尺宽，六尺深。墙内有内壕一道，墙外有外壕二道或三道，壕内须密钉竹签”云云。岳州之溃败，即系未能扎营之故。嗣后当严戒各营也。

一、调军出战，不可太散，此后不可分散。然即合为一气，而我军仅五千人，贼尚多至六七倍，拟添募陆勇万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贼阵法，平日男训戒极多，兼画图训诸营官。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璞山并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贼了无伎俩，并无所谓抄尾阵。寄交杨名声、邹寿璋等，回信言当留心，慈训言当用常山蛇阵法，必须极熟极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交手不过一个时辰，即纷纷奔退，若使贼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若兵勇无胆无艺，任凭好阵法，他也不管，临阵总是奔回，实可痛恨。

一、拿获可疑之人，以后必严办之，断不姑息。

大乱之弭，岂尽由人力？亦苍苍者有以主之耳。

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此事登场甚易，收身甚难。锋镝至危，家庭至乐，何必与兵事为缘？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

扎营不可离城太近，宁先远而渐移向近，不可先近而后退向远。

多则不悞，悞则不多，盖贼多，则中有裹胁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绽，吾转得乘隙而入矣。

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

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尔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扎营，不可离城太近，盖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以防范，奸细混入，难于查察。节太短，则我军出队，难于取势，各营同战，难于分股。一经扎营之后，再行退远，则足馁士气，不如先远之为愈也。牵率出队之弊，所以难于变革者，盖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一遇贼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来则感其相援，不来则怨其不

救；甚或并未差挫，并未接仗，亦以令箭报马，预请他营来接应。习惯为常，视为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虑他日之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战阵呼吸之际，其几甚微，若尽听他营之令箭，牵率出队，一遇大敌，必致误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须与各营委曲说明，三令五申，又必多发哨探，细侦贼情，耳目较各营为确，则人皆信从，而前弊可除矣。

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椽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瓦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吾所见诸将，于三者略得梗概，至于善觇敌情，则绝无其人。古之觇敌者，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某伪主不协，今则不见此等好手矣。即以此四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伏，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临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时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

开仗，其道迥别。去城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溪，细细看明，各令详述，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隘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古人忧学之不讲，又曰明辨之，余以为训练兵勇，亦须常讲常辨也。

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偶作一对联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安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骚扰事情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隳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

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

今年军事，沅弟缄言：“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事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

未有主帅晏，而将弁能早者也，犹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长晏，而子弟能早者也。

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家教，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即挖长濠，切不可过濠打仗，胜则不能多杀贼，挫则不能收队也。

贼初来之日，不必出队与战，但在营内静看，看其强弱虚实，看得千准万确，可打则出营打仗，不可打则始终坚守营盘，或有数分把握。

现讲求守垒之法，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倘有疏虞，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

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呐喊、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

吾兄弟无功无能，俱统领万众，主持劫运，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帖，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只要两弟静守数日，则数省之安危，胥赖之矣。至嘱！至要！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濠深

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鲍为正援集贤之师，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濠之军，此人事也，其临阵果否得手，能否不为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弟于人力，颇能尽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则好代天作主张矣。

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极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追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贼之亏，不战而跑回，则长贼之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将看地势者，相戒不带队伍也。又两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约期打仗，凡约期以号炮为验，以排枪为验，以冲天火箭为验者，其后每每误事。余所见带队百余人以看地势，及约期打仗，二事致败者累矣。

攻城攻垒，总以敌人出来接仗，击败之后，乃可乘势攻之。若敌人静守不出，无隙可乘，则攻坚徒损精锐。

用兵人人料必胜者，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

大凡扎险地，与久经扎定者，迥乎不同。久经扎定者，濠已深，墙已坚，枪炮已排定，虽新勇亦可隐守；初扎险地者，虽老手亦无把握。久扎者千人守之而有余，初扎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

凡军事，做一节，说一节，若预说几层，到后来往往不符。

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芒。如鲍军或打南岸，或留北岸，此大处也，往返动须二月，调度不可错误。北岸或扎集贤关，或攻宿松，南岸或援江之瑞义，或援鄂之兴冶，此小处也，往返不过十日，临时尚可更改。

盛暑酷热，若出队站立烈日之中，历二三个时辰之久，任是铁汉，亦将渴乏劳疲。若挂车河官军作坚守之计，任贼诱战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亦一法也。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今生，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当此酷暑，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多公亦宜用“静”字法。此贼万无持久之道，弟不必虑多军之久困也。（我所谓静者，不焦急耳！）昔曹操八十万，自荆州东下，吴以五万人御之，而周瑜策其必败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刘表水师新附，不乐为用，三料暑热久疲。其后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布袋、草把，此二者，皆余阅历之事。余攻九江，办布袋万个，为填壕之用，令每人装土于袋，负之丢于壕中。乃十二月朔日进攻，每袋仅一寸厚，千余袋不能填得一丈宽，而千余人断不能站在一处，每处数十人，竟未能填一尺厚。是日伤人最多，此布袋之难用也。攻瑞州时，刘峙衡以稻草填壕，已填一丈宽，过壕十余人矣，贼以火蛋抛出，稻草悉燃，烧死数十

人。第二次峙衡用湿稻草，贼以枪炮击之，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踊跃，遂不能过濠。瑞州濠深不盈丈，尚且如此，此稻草之难也。

水师向本骄傲，又得数次小胜，则全是矜情躁气，偶然小挫，则怯态毕露。欲调度水师，无但取其长而忘其短，总以看明支河小汊为第一义。

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与其顿兵城下，由他处有变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盘旋作势，为一击必中之计。

剿抚兼施之法，须在军威大振之后。目下各路俱获大捷，贼心极涣，本可广为招抚，第抚以收其头目。散其党众为上；收其头目，准其略带党众百人为次；收其头目，准其带所部二三千，如韦军者为又次。若准其仍带全部，并盘踞一方，则为下矣。

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宠奖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切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万里长濠，大众公守，最易误事，一蚁蛰堤，全河皆决。

地方虽宽，分别极冲、次冲，究无多处。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于极冲、次冲之地，择人守之，则他处虽有劣营，亦可将就支持。

临战之际，预先爱惜士卒精力，以备届时辛苦熬夜，犹考试者场前静养也。

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已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

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专盼多军，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后因失望而气馁也。

待贼疲乏散漫之时，猛然出队力战，如用此法，总须善于相机，第一要看贼散布在我营外最近之处，第二要看贼疲乏思归之时，第三要辨得贼之强枝安在，弱枝安在，乃可交手。

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此次弟以二万人驻于该处，大不得势。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守，亦所以蓄气也。

既不能围城贼，又不能破援贼，专图自保，自以气敛局紧为妥，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及今缩拢，少几个当冲的营盘，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每夜少几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气

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不仅此次也。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可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兵无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为法，拘左之机以为机，然亦可资参采。大约与巨寇战，总须避其锐气，击其惰气，乃为善耳。

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僨事。至嘱！至嘱！

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

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望弟早早定计，贼不解围，则忍心坚守，贼若解围，则以追为退，不著痕迹。行兵最贵机局生活。

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壹听之人，顺不顺壹听之天而已。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审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弟当初以孤军进雨花台，于审力工夫微欠，自

贼到后，壹意苦守，其好处又全在审力二字，更望将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骄必败。”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不审力，则所谓骄也，审力而不自足，即《庄子》所谓哀也。

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经书、八股，则浮矣。

凡行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之道也。弟营现虽士气百倍，而不肯浪战，正所谓留有余之力也。孤军驻雨花台，后无退路，势则竭矣，吾欲弟于贼退后，趁势追贼，由东坝进溧阳、宜兴，所谓蓄不竭之势也。

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既得之后，贼乃知其为要隘，起而争之，则我占先著矣。

吾辈当一面顺天意，一面尽人事，改弦更张，另谋活著。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

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

輜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掣，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易，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休之时。

大炮守墙，余嫌太笨，现在劈山炮，专为守墙之用。弟以后宜少用笨重之物，此陆军第一要诀。

余所以不愿多立新营者，一则饷项极绌，明年恐有断炊之虞；二则局面愈大，真气愈少，和张晚年覆辙，只是排扬廓大，真意消亡，一处挫败，全局瓦裂，不可不引为殷鉴。

雨花台老营，须十分坚固，能于最冲地方，筑石垒数处，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人守之而无虑，宜用劲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无妨，则临分兵之时，便益多矣。

军中消息甚微，见以为旺，即寓骄机。《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其义最宜体验。

天下皆称向兵为天下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著笔也。弟用兵之规模，远胜于和，而与向相等。杏南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于调回，则空处全不著笔，专靠他军，可尽恃乎？

只要水路无接济进城，陆路纵有接济文报，贼亦终无可久之道。若必围得水泄不通，恐困兽犹将死斗，一蚁溃堤，全局皆震，不可不防。

傍城而战，例为彼此杀伤相当之局，以后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则断粮路为要者，不在日日苦战也。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

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臻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镇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弟亦好从呆处著想。霆军五月从燕子矶南渡，本是呆著，挖地道则更呆。此际皖南危急，不能不调之使活耳。

大凡办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处，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矣。

盖大致米粮难入，则城中强者可得，弱者难求，必有内变争夺之事。若合围太紧，水泄不通，无分强弱，一律颗粒难通，则反足以固其心，而无争夺内变、投诚私逃之事矣。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大炮守垒，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则可不必。吾在水营多年，深知大炮之长短。凡炮火之利有二，曰及远，曰命中。大炮之大子可以及远而难以命中，谓其愈远则行愈迟慢，且有声

可以回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横穿也。其群子则以命中而难以及远，包得合膛，筑得极紧，可及二三箭之远，否则仅及一箭而已。群子所能及之处，先锋包亦几能及之。军兴日久，各弁勇事事外行，徒慕大炮之名，见贼在二三里外，纷纷开大炮大子击之，喜其响之震、烟之浓而已。见贼不畏炮而排进如故，则以为凶悍无匹，而不知大子实不伤人。昔余在水营时，教将弁专用群子“包得圆，筑得紧，开得近”三语者，内湖各营，罕能做到，外江间有做到者，便是无敌之将。

四五万人，同时遣散，必无许多银钱，而从轿者愿息，抬轿者不肯，其中又有许多人情物理，层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凡子弟生徒，平日懒惰，场文荒谬而不售者，则当督责之，至平日劳苦，场文极佳而不售者，则当奖慰之。弟所给诸将，皆劳苦佳文之生徒也。

捻匪长处，在专好避兵，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兵则马、步夹进。马队冲突时，多用大刀长棒，步队冒烟冲突时，专用长锚猛刺。我军若能搪此数者，则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劈山炮尤为捻匪所畏。

各军得悉萃于西南山多田多之处，剿办当稍易为力，恐其半过沙河以南，半留沙河以北，则尤疲于奔命耳。

百战之寇，屡衰屡盛，即仅存数十人，尚是巨患，况数万乎！人心日伪，大乱方长，吾兄弟惟勤劳谦谨，以邀神佑，选将练兵，以济时艰而已。

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观擒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擒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山寨，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协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不受创。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

余与少荃皆坐视贼太轻，以致日久无功，弟则规视贼尤轻。庄子曰：“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咸丰三年以前，粤匪为哀者，咸丰十年以后，官军为哀者。今肃匪屡胜，而尤谨畏如故，官军屡败，其骄蹇如故，是哀者，尚在擒也。可虑孰甚！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省三、琴轩，均属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识微之论，而实不能平心细察。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可奖成之。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以上《家书》）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

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动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边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割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则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在即墨，坐则织蓐，立则仗钺，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澠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论。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与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散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东、河南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挥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为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罌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罌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

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諏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约期打仗，最易误事，然期不可约，信则不可不通也。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凡攻垒，一扑再扑，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

守城煞非易事，银米、子药、油盐，有一不备，不可言守备矣——又须得一谋勇兼优者为—城之主。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匮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则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二三。目击心伤，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于将官委员告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

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

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情之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无情时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受，虽小必济。”娄敬所谓“逆取顺守”亦此意也。军营用民夫，其先则广取之，虐役之，其后则体恤必周，给钱必均，法可随处变通，总须用人得当耳。

洋烟为坏营规之最，尽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点名，卯正辰初，即可点毕，嗣后每早，或查营，或点名，或看操，三者总行其一，不专行查营一事也。

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

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

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而骄气即与之相连；不可无安详之气，而惰气即与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况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

凡修垒以壕深为妙。木城及外墙，均有流弊，恐反为贼遮蔽炮子也。

修碉之事，军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为基址，亦行军一法也。择地有两法，有自固者，有阨贼者。自固者，据高山，择要隘；阨贼者，择平坦必经之路，择浅水津渡之处。嗣后每立一军，则修碉二十座，以为老营，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来梭剿，庶几可战可守，可奇可正，得四军可靠者，则

变化无穷。于景镇作一榜样，而他军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为法术，亦可得见乎？

与李少荃、许仙屏言团练之无益于办贼，直可尽废，如必欲团练，则不可不少假以威权。

近年取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是，乃败道也。

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余至武昌火药局，看造火药之法。以铜为轮，以铁为辗，圜地为大磨盘，以牛碾之。盘大径二丈三尺，周围七丈许，每盘用四牛，每牛速曳两轮。盘外周围沟槽，约宽八寸许，火药在槽内，牛行槽外，驭牛之人行槽内，每牛以一人驭之，每两牛四轮之后，则有铲药者一人，随之执铜铲，于槽内铲动，庶辗过之后，火药不患太紧也。又有小磨盘，磨矿与磨麦相似，仅用一人。又有柜、筛矿、筛炭。其法绝精绝，非图说不能

明。

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则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冶造就。

凡军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淹滞之色。须时时察看，而补救之。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军务须从日用眠食上下手。

吕蒙诛取铠之卒，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则无以警众。

窄路打胜仗，全系头敌数人，若头敌站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人挤退了。

出青之法，即《汉书·赵充国传》所谓就草。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见，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当兵勇，则思于兵勇翹然而出其类；同当长夫，则思于长夫中翹然而出其类；同当将官，则思于将官中翹然而出其类；同为主帅，则思于众帅中翹然而出其类。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于声律，故听音乐而知兵之胜败，国子存亡。余生平于音律算法，二者一无所解，故不能知兵耳。

用兵之难，莫大于见人危而不能救。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圆牌，

即今之藤牌也，统谓之曰挡牌。又有所谓刚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于外，而以湖绵搓成小团，及头发装于内，盖戚氏自以巧思制造，非有师于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御矢石，今之挡牌，所以捍御炮子，炮子所当，无坚不破，岂矢石所可同年而语哉？国藩初办水师时，尝博求御炮子之法，以鱼网数层，悬空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絮被渍湿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生牛皮悬于船旁，以藤牌陈于船梢，不能御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刚柔牌，不足以御炮子明矣。鸟枪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御之，抬枪子、劈山炮子，凡大如黄豆以上者，竟无拒御之法。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子之无可御，遂屏弃鱼网、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其麾下，水师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无所回避。明于此义，而古来干盾橈牌诸器，皆可废矣。友人刘腾鸿峙衡治军，刁斗森严，凛不可犯，临阵则伏根行首，坚立如山，有名将之风，惟过于自慕。在武昌时，尝独立城下，呼贼以炮子击之，贼发十余炮不中，坚坐良久乃还。在端州时亦如是，卒以徇难。殒我壮士，人百莫赎！此则刚毅太过，于好谋而成之道，少有违耳。

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以生铁令铸工铸之，渣滓未融，经药辄散，且多蜂眼，鸣而不能及远。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其法以铁先炼成直条，每条烧红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圆颗，又烧其端，又打成颗。——每颗如葡萄大——后至江西，商之姚镶，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为铁模，半涡截铁条之端，置之模中，宛转锤炼，圆滑可爱，于是及远较多一里有奇

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群子，均用此法。每炮用百余颗，多者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然流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朱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袁顗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游，兵强地盛，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铁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湫，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岸，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与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掳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湫，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将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袁顗等在

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前青、冀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镇不服，青、冀难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冀、青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或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之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送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

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趋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蹶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侯击琳舰，又以蒙冲小船，击其舰，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蹶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平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颂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强，愿假臣精兵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能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琬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泌欲使建宁要自灵夏并丰胜、灵朔之寨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远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佑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

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十六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勒，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佑、李忠义镬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日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冬，十月壬申，帝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廷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乙亥，帝发郓州中

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国藩按：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郢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江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于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蕲州，秦日纲据田镇，我舟师越蕲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蕲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夜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二十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

二人，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以上《日记》）

疆场之役，所以磨练豪杰之资也，前代如王伯安、孙高阳，其初亦不过讲求地利耳，其后遂为儒将，岂不贵乎阅历哉？

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宁乡两县，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练局，但在城内立一总局，两处多设探报，贼至则风雨疾驱，仍可御于境上。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

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

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多，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丘山，亦良可深虑也。

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酬，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今日之兵，概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期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又有主将远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构隙，虽奉令箭，故迟回不往救者。至于兵与勇遇，尤嫉恨刺骨，或且佯为相救，而倒戈以害勇，冀蔽以纵贼。

“团练”二字，当分为两层，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即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成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

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导，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近时各营之兵，东调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则不相救，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携贰，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

张，或有成功之一日。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缺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故弟尝谓，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带勇之人，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辄轨，终不能行一步也。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宠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财尽则冷落兽散。

练卒宜十分精强，器械宜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不然，则不教之卒，窳败之器，何省不可骤办，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

各勇不穿着软料衣服，止许穿布衣，不许穿鞋，止许穿草鞋，哨长亦然。打仗同进同退，不许独后，亦不许独先，割首级，夺旗帜，亦无赏。

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前与璞山面议，每营有文武兼备之营官，始克照料一切。

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窳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以馁矣，虽有一二主者忠义奋发，亦无以作其众而贞于久也。

国藩立朝有年，更事孔多，曾不能以泛悠之毁誉，定伦类之优劣，财有军务所关，不揆事理之当否，而徒贵耳贱目，逞我私臆乎！

阵法原无一定，然以一队言之，则以“鸳鸯”“三才”二阵为要；以一营言之，则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断不可缺一。此外自为变化。将多人以御剧寇，断不可无阵法也。

江中鏖战之船，须二百号，其余雇备民船，随助声势者，须八百号。战船之中，每号配水勇二十人，民船之中，凡煤米油盐百货之需，无不装载，技艺工匠杂流之人，无不备具。船行中流，两岸陆兵，夹江而下，兵勇所得之银，换舟中之钱，所用之钱，即买舟中之货，庶兵勇所至，无米盐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而展转灌输，其银钱仍不出乎水陆两营之外。

两岸陆路之勇，夹江而下，兵勇所得之口粮银两，即换舟中之钱，所用之钱，即买舟中之货，庶无盐米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而银钱展转灌输，仍不出水陆两营之外。否则，陆勇数千，贸然一行，九江以下，千里萧条，无食可买，无钱可换，虽有忠奋凌霄，亦只得向江水而痛哭耳！是以国藩私计，总须舟载食物，水陆并进。

水勇佳者难得，然不难于放炮，而难于荡桨使舵。国藩之

意，拟即专雇水手，盖水师不可遽学为水手，水手却能即学为水师。

水路有战船，必须两岸劲兵夹江护行。

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队之习气，虽语涉谐谑，实痛切之言也。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斩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不杂入营稍久之兵，不用守备以上之将。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平昔咎人出征迟滞，或咎人军兴浪费。及身膺斯责，则其迟滞尤久，而其浪费更多。履之后艰，于兹益信。

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之来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贼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疵，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进则争前，退则散乱，三五人保住阵脚，即是劲旅，无此三五人者，则其初每成先胜后败之局，其后遂为屡北不振之师，此盖军旅强弱之恒态。

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

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抚贼之备物太甚者，其中盖有所不足也。以精心察之，冷眼窥之，无乘以躁气，无淆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阅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不克见，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

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彧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具战而徐算。

士卒不许有一人闲言闲语，稍触别营，不特宜戢本营六营，兼宜小心和协别营之将领。兵，犹火也，勿戢将自焚也。

军事以气为主，淪去旧气，乃能重生新气。若不改头换面，长守此坚壁，以日夜严防而不得少息，则积而成陈腐之气，如败血之不足养身也。

濠中之士，宜覆于墙上，不可覆于外濠，宜壁立斗绝，不可斜坡陲下。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自仆行军以来，每介疑胜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其后常为大胜，或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狙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军行，以水泉甘洁为最难得之境，其无活水清泉之处，不

可驻也。

用兵之道，与读书同，不日进则日退，须“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妙。

目下贼氛正盛，我军宜蓄税以俟时，沉几以观变，如必须退兵，则不妨少退以蓄势，待得机然后再进。兵法有进有退，古名将非全无退时也。望斟酌行之。

崖角岭一冲太长，进冲甚易，退回甚难，此行兵者忌也。此时审几度势，但宜稳扎，不宜轻进，名将以救败为第一难事。

凡兵勇太少则军威不壮，太多则弱者间或反为强者之累，弟之不肯轻用团勇，亦执是故。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势，而临阵又不为其所累，则有益而无损，到处乡团皆可用矣。

国藩平日不善临阵，故友人相戒，但宜在远处调度，不宜至近处对敌，恐各统领营官分心以护卫鄙人，转不能冲锋应变，出奇制胜也。

连日各处募勇者甚多，应募者渐少，卒之择将甚于将之择卒，朝秦夕楚轻去其主，辛苦教练，甫觉可用，转瞬已失其所在矣。或在此营当散勇，则贪易一营以充什长，甫得什长，又思易一营以充哨长。若兵则壹列尺籍，终身不改，鄙意欲借兵呆板之风，稍变勇浮动之习。

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求人以统领为最难，营官亦颇不易得。

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兵勇愚蠢，自须专习一途，以壹其心志。上岸杀贼，洗足上船之说，当筑濡须坞时，

已知其不可行矣。

军家之一胜一败，其炎凉意态，往往出素所亲爱之人，若更事稍多，亦自见惯不惊。

两次挫失之后，弁勇心目中，不无轻疑主将之意。田单拜神人为师，亦以势弱恐下不我信也。望于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怀，无当大股，无贪奇功，得小小胜仗数次，则士气渐转而可有为矣。

防守之统领，已属难得，游击之统领，尤为可遇而不可求。阁下静能生明，专在人材上用心，犹为费力少而收效多，何如？

将来贼平之后，勇则归农，弁目之精强者，则得缺归伍，亦销患之一道也。

承询选将一节，猥以湖湘俊彦明兴，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瞽瞍，奚足以言衡鉴？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于鄙钝初无与也。抑又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稳扎坚守，严纪律而爱百姓，尚属人力之所能勉，行之不懈，亦弭谤之一端也。

古来义士仁人，行军用兵之道，专重救人之急，解人之围，是以义声播于遐迩。

来教“分制援贼，包打胜仗”等语，无乃期许过奢。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守黄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

贼，则敬谢不敏。“人贵自知”，不敢不确陈其短耳。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所最难者，近日调兵、拨饷、察吏、选将，皆以应酬人情之道行之，不问事势之缓急，谕旨之宽严。苟无人情，百求罔应，即举劾赏罚。无人情则虽大贤莫荐，有人情则虽巨慝亦释，故贼焰虽已渐衰，而人心殊未厌乱。每独居深念，憾不得与阁下促膝密语，一摅积愫。

凡临敌观气色，有二可虑，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淫溢也，大也，漫也）；惰气，则有晦滞之色（晦晦也，暗也）。望体察而补救之。

骄气惰气等语，却不宜与人说及，此等默察之而默救之耳！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鄙意欲仿六年八月鲁家港御石逆之法，直待贼来扑营，坚壁不出，待其惰归而后出击，亦不远追，如是二日，彼之锐气少沮，我之识力稍定，然后设法击之，则真贼与裹里雇者，情状分明矣。

河淮以北之民，赋性刚劲，耐寒习苦，囊裹干粮，且行且食，以该处之兵，办本地之贼，必可得力。若敝部皆衡湘之士，狃于南方风气，不惯面食，冬至风帽皮衣，炭盘手炉，刻

不能离，罗、李名将，亦不免于冬烘气象。

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望阁下实心行之，幸勿视为老生常谈也。至于战胜攻取，虽无把握，若守之必固，则可以人力操其权。

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云“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平日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无惰时矣。外间或言阁下好笼罩人，己所不知者，以言诘人使言之，人言未毕，则又以己意承接而引伸之，好以聪明绌人而不至诚待人。国藩久闻此语，未便遽进箴规，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凡军中大小事件，殷殷请教于朱云崖，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

早夜站墙，日日操练，断不可闲。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黎明早起，勤字中之一端也。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

则血性必减一分。八九两年，余过湖口时，彼此皆不免有官气，此次余与厚庵阁下，皆当力戒以挽风气。

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

军事是极质之事，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退庵若以编辑廿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鄙人近岁在军，不向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家世寒素，深知一粒一丝之匪易。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与将官委员告戒，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虽行之未必有效，差幸与阁下来示意趣相同。

主守则专守，主战则专战，主城则专修城，主垒则专修垒，切不可脚踏两边桥，临时张皇也。

战时无他谬巧，大约队伍不错乱，枪炮不早发，二者即操可胜之权。贼若凭坚城而守，我军仰攻，断难得手。

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

布置须四路照顾，不可挤在一处。贼若来时，当头敌者，须择一好手，窄路打仗，胜败全系头敌数人，若头敌站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人挤退了。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求阁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徽防掣眷扰民，习气已深，实难挽回。吾辈当共习勤劳，先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阁下若有志斯事，或零招一二哨训练，绳以敝处营规，尽变徽防积习，如果可用，则逐渐增加，以是保卫珂乡，即以是共维大局。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凡攻垒，一扑再扑而人不动者，则气必衰减。

择地有两法，有自固者，有扼贼者。自固者，择高山，择要隘；扼贼者，择平坦必经之路，择浅水津渡之处。嗣后每立一军，则修碉二十座以为老营，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来梭剿，庶几可战可守，可奇可正，得四军可靠者，则变化无穷。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

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阁下常犯此二忌，嗣后望勤加训练，不患无交战之时，但患无能战之具耳。

石垒之法，约二丈二尺高，在土内基址砌四尺，出土外者一丈八尺，厚如修敦仁碣之式。一丈以上安门，门上不过一二尺耳，大可容一哨人（合勇夫不过百二十人），断不可再大。内作四舱，火药舱、水舱，上不住人，子弹舱、米盐舱，上可住人。墙不甚厚，则守垛者无子墙可站，宜于砌至丈五六尺时，用横木砌于砖石之内，架板于横木挑之上，如栈道然，以备站墙之用。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老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或我寻贼去先发制人，或贼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一出也。（以上《书札》）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太平洋。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宽外圈窄。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糟。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逐驱闲杂人。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薰。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细思，出队要分三大支。中间一支

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队伍排在山坡上，营官四处好瞭望。看他那边是来路，看他那边是去向。看他那路有埋伏，看他那路有强将。那处来的真贼头，那边做的假模样。件件看清件件说，说得人人都胆壮。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打散贼匪四山逃，追贼专从两边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队伍切莫乱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营队伍莫乱参。四六队伍走前后，锅帐担子走中间。不许争先太拥挤，不许落后太孤单。选个探马向前探，要选明白真好汉。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细看。遇着树木探村庄，遇着河水探桥梁。遇着岔路探埋伏，左边右边都要防。遇着贼匪来迎敌，飞马回报不要忙。看定地势并虚实，迟报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马走前站，后有将官押尾帮。过了尾帮落后边，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出营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来站个班。营门摆设杖和枷，闲人进来便锁拿。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太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安排，传齐夫勇点名来。营官三夜点一次，哨官每夜点一回。任凭客到文书到，营门一闭总不开。衣服装扮要料峭，莫穿红绿惹人笑。哨官不许穿长衣，兵勇不许穿软料。脚上草鞋紧紧穿，身上腰带紧紧缠。头上包布紧紧扎，英雄样子都齐全。第五军器要整齐，各人制件好东西。杂木杆子溜溜圆，又光又硬又发绵。常常在手

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钱。锚头只要六寸长，耍出杨家梨花枪。大刀要轻腰刀重，快电如闪白如霜。枪炮钻洗要干净，铅子个个用合膛。生漆皮桶盛火药，勤翻勤晒见太阳。锄锹撅子要粗大，斧头要嵌三分钢。火球都要亲手制，六分净硝四分磺。旌旗三月换一次，红的印心白的镶。统领八面营官四，队长一面哨官双。树树摇出似飞虎，对对走出如鸳鸯。第六兵勇要演操，清清静静莫号嘈。早习大刀并锚子，晚习扒墙并跳壕。壕沟要跳八尺宽，墙子要扒七尺高。树个靶子十丈远，火球石子手中抛。闲时寻个宽地方，又演跑队又演枪。鸟枪手劲习个稳，抬枪眼力习个准。灌起铅子习打靶，翻山过水习跑马。事事操习事事精，百战百胜有名声。这个六条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宝。兵勇甘苦我尽知，生怕你们吃了亏。仔细唱我得胜歌，保你福多寿又多。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紧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眼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队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驴马又牵猪。鸡飞狗走

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陪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嘉，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唱熟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这解散歌。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种种苦情说不完，说

起阎王也心酸。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有胁从皆免死。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寸皆遣发。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人人不杀都壮胆，各各逃生寻去向。贼来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以上《杂著》）

治兵语录

曾国藩 著

蔡锷 评

一、将 才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廉恕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语 一）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普，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以上曾语 二）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以上曾语 三）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编者按：曾、胡，指清代名臣曾国藩、胡林翼，下同。）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以上蔡松波评语）

二、用 人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一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以上曾语 四）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以上曾语五）

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级官之上位也。）

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彼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握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以上蔡松坡评语）

三、尚 志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谓浩叹者也。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

之气，而未常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以上曾语 六）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以上曾语 七）

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富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以上蔡松坡评语）

四、诚 实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人必虚中，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一有着，则私也。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辘轳，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

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楚军水陆师有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变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诤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浮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

自古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顰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知讲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以上曾语 八）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以上曾语 九）

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

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且转相疑骇。于是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李广疑石为虎，射之没羽，荆轲赴秦，长虹贯日，精诚之所致也。（以上蔡松坡评语）

五、勇 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嶮嶮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以上曾语十）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以上曾语 十一）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有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忍耐千万。“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以上曾语 十二）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速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速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惟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貽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以上蔡松坡评语）

六、严 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瘡痍，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剗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肉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性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深，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以上曾语 十三）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堕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

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浇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当此沴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以上蔡松坡评语）

七、公 明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慨沉世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大抵治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

矣。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晓暖，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学问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剔除矣。（以上曾语 十四）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

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之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宗棠，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自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益，亦足心安理得。（以上蔡松坡评语）

八、仁 爱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凜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以上曾语 十五）

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以此存心，则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戒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爱其父兄矣。

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生死，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国为家之集合体，卫国亦所以卫家。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则应视此第二家庭为重，此以义言之耳。

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报其反抗，是自困也。即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于无辜之民。致上千天和，下招怨讟，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以上蔡松坡评语）

九、勤 劳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事懒矣。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耐饥寒者。吾辈当共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

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点几积压较少。

养生之道，莫大于惩忿窒欲，多动少食。（以上曾语 十六）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以后总求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应事接物时，常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极浅处着眼，莫从深处细处看。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而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不轻进，不轻退。

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国事之处无多，更宜勤诚以图之。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既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穡，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晚思，以求有济。而法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意味。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以上曾语 十七）

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弛驱酷暑恶瘴之乡，

或趁雨雪露營，或昼夜趨程行軍。寒不得衣，飢不得食，渴不得水，槍林彈雨之中，血肉橫飛，極人世所不見之慘，受恒人所不經之苦。其精神，其體力，非于平時養之有素，練之有恒，豈能堪此？練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場為歸屬。欲其效命于疆場，尤宜于平時。竭盡手段以修養其精神，鍛煉其體魄，嫻熟其技藝。臨事之際，乃能有恃以不恐，故習勞忍苦，為治軍之第一要義。而馭兵之道，亦以使之勞苦，為不二法門。蓋人性似猴，喜動不喜靜，宜勞不宜逸。勞則思，逸則淫，閑居无所事事，則為不善，此常人恒態。聚數百千血氣方剛之少年于一團，苟无所以范其心志，勞其體肤，其不逾閑蕩檢潰堤出防之外者，烏可得耶？（以上蔡松坡評語）

十、和 辑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齟齬，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馀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以上曾语 十八）

沅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亦恐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雪谓彭雪琴，即彭玉麟也；沅为曾沅浦，即曾国荃也。）（以上曾语 十九）

古人相处，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

助于疆场，盖不以公而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惟以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发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不一而足。故老相传，言之凿凿，从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间，罔知大体，动以意气用事，无怪其然。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乃可以言破敌。（以上蔡松坡评语）

十一、兵 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总须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七八百，大小炮千馀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哂。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

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破逼阳，气已竭而后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飞高，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才，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刑折，且聚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这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以上曾语 二十）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馀之力。（以上曾语 二一）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以上蔡松坡评）

十二、战 守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谕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夕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

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以上曾语 二二）

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飘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

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

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即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餘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力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以上蔡松坡评语）

责任编辑：夏剑钦

周 斌

封面设计：胡 颖

曾国藩 嘉言钞
治兵语录

梁启超 蔡 锷 选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000 印张：10.25 印数：1—3,900

ISBN 7-80520-408-X/I·237

定价：(精)9.80 元 (平)7.30 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ISBN 7-80520-408-X

I·237 定 价：9.80元